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毛泽东周恩来与《参考消息》报

张闻天总书记任内的最大贡献

徐光耀：忆一段「头朝下」的历史

胡绳为邓小平理论鼓与呼

蒋经国出掌台湾谍报系统

2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北京）

瞻仰胡耀邦陵园



去年5月下旬，我专程从南昌来到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从南昌北上到九江的高速公路，行60公里，东走普通公路10公里，便到了“共青城”。这共青城是50年代末，胡耀邦作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时，组织上海学生开垦鄱阳湖西岸荒田时建的。十一年前胡耀邦逝世，共青城人要求将他的骨灰在这儿安葬，胡夫人李昭、胡长子胡德平也同意这要求，就这么定了下来。这天我来到共青城，一位老人说，胡耀邦骨灰葬这儿定了，具体在那里呢？胡德平和我们先大体选定了现在这块西傍小山、东望鄱阳湖的地方。那天我们上这小山确定确切地址时，天阴雨作，到现在葬骨灰地点时，天豁然开朗、太阳露了出来。胡德平说：“看来我爸爸喜欢这里，定吧。”这陵园大体仿南京中山陵的格局，当然无中山陵的气魄。上有一巨大的“△”型石碑，碑右上端有胡耀邦浮雕，下有大理石刻下的中共中央给胡耀邦一生的评价。它



占地百十亩，尽是树木花草。站在这往东遥望，是无边无际的鄱阳湖冲积平原。这时会产生许多遐想的：胡耀邦对改革开放事业有着彪炳史册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发地尊敬他怀念他。这人大概就是前来凭吊的人络绎不绝的缘故吧！



杜导正 文并摄影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毛泽东周恩来与《参考消息》报……………卫广益
7 张闻天总书记任内的最大贡献……………张培森

求 实 篇

- 14 胡绳为邓小平理论鼓与呼……………余广人 胡 申

亲 历 记

- 21 昨夜西风凋碧树
——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上)……徐光耀
38 我在国际场合见到的周恩来……………司徒眉生

人 海 浪

- 43 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邱 健
49 “法国通”李风白……………蒋国经

群 言 堂

- 53 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王景山

文 荟 苑

- 56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马亮宽
62 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宋金寿

遗 闻 录

- 66 蒋经国出掌台湾谍报系统……………木 木
71 1958: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一次畅想……………陈清泉

故 纸 堆

- 13 珍贵的笔记本
——毛泽东为于江题词……………申 春

异 国 情

- 72 在英国感受的人际默契……………李 岚

九 州 景

- 74 麋鹿的发现与失而复得始末……………郭 耕

编 读 窗

- 77 复熊向晖质疑……………王 瑒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赵朴初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毛泽东周恩来和《参考消息》报

□ 卫广益

《参考消息》报是一张特殊报纸。几十年来，它以不同于一般报纸的独特报道内容和浓厚的参考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日报之一。中国广大读者能看到这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毛泽东倡议创办《参考消息》报 并一再指示扩大阅读范围

《参考消息》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开国头几年，一直是仅供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参阅的秘密级内部刊物。1956年冬，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把它的订阅范围由“党内外高级领导干部”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党内外干部”，计划将发行份数由原来的2000份增加到30—40万份。适应发行量大增的形

势，《参考消息》由刊物型改成报纸型出版，即办成《参考消息》报。

1958年9月，毛泽东又指示：“要把《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的高等院校学生”。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严重不足，《参考消息》报不得不严格控制甚至压缩订数。当经济形势和纸张供应情况好转后，毛泽东便又提出增加《参考消息》报的发行份数。1964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以后要逐步扩大。可以增加至50万份、80万份。只要纸张问题能够解决，做到每个公社、每个工厂都有一份，还可以发给个人。”一个月后，他又提出，“《参考消息》发行量今后增加到100万份。”

“文革”开始后，《参考消息》报的扩大发行一度受到影响。1970年夏初，毛泽东又作出指示：要“把《参考消息》办好，扩大发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经过认真研究和积极准备，决定从1970年8月1日起，将《参考消息》报“扩大发行到工矿企业车间党支部，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解放军连队党支部，供广大干部和高等院校学生阅读。”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扩大《参考消息》报订阅范围的非议，毛泽东说，《参考消息》可以贴到大街上的阅报栏内，让大家随便看。

毛泽东确立办 “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的方针

为什么要办《参考消息》报并扩大它的发行量？毛泽东主席1957年初接连在全国省、



1963年，毛泽东与新闻工作者交谈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高国务会议和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人们会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出钱办份报纸来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看样子是这样。……(它登的)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的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主席特别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人要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敌人的情况”;“要经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的是不牢固的”。他又说:“党内外都应受锻炼,应该见世面,要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样的。有人说这样会乱。不会乱的。”

1958年秋,毛泽东在指示把《参考消息》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时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让他们经常阅读《参考消息》,经常对比敌我两方面的宣传,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每个问题都有对立面,这样才能培养他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

针对有同志担心群众看了反面宣传会受影响,毛泽东说,“是不是受他们(指西方)的宣传影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变一、二个。我们中国人多,……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是不是读了他(指蒋介石)的文章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嘛”。

根据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50年代末、60年代初,《参考消息》报刊登了大量西方反华文

章,并多次刊登,有的外国报纸诬蔑中国、丑化毛泽东形象的漫画。与此同时,《参考消息》也刊登了一些讲我们好话、而又不能在报纸上发表的东西。

毛泽东的谈话、指示和批示,给《参考消息》报做了明确定位,对这份特殊报纸的方针、任务和特色阐述得一清二楚,这是办好《参考消息》报的理论基础。

周恩来亲自指导纠正 报纸“倾向性太大”问题

周恩来生前为把《参考消息》报办成毛泽东要求的“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倾注了很多心血。

在筹备《参考消息》改为报纸并扩大发行期间,周恩来正在出访亚洲和欧洲的11个国家。他在访问亚洲国家后回到北京为访欧做准备,时间只有短短四天,有许多重要事情需要处理。但他在百忙之中仍挤出时间亲自审阅《参考消息》改报试刊稿件。从试刊稿原件上留下的勾、划、点、圈毛笔墨迹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参考消息》改报扩大发行的高度重视和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参考消息》报长期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在自身处境困难、日理万机的同时,还亲自直接指导报道工作,大力纠正《参考消息》报道当时出现一些倾向性的问题。

“文革”前夕,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参考消息》报的报道倾向性趋大,主要刊登赞扬我国的稿件,宣传色彩比较浓厚。针对这个苗头,周恩来1966年2月,接连两次提出批评:“《参考消息》倾向性太大。不能光登对中国好的反应,都是称赞的,也要适当登一些反面的东西,骂我们的东西”;他指出:“《参考消息》的标题倾向性太大”。

1967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批评“参考报喜不报忧”,指出:“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况”。

“参考报喜不报忧”现象当时趋于严重的一

一个重要原因是受陈伯达、姚文元一伙当时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陈、姚当时主管新华社，姚文元提出参考报道要用批判的语言，对敌性材料要改写。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对参考报道更加关注。从1968年起，周恩来的指示、批示大为增多。据不完全的记载，1968年5次，1969年8次，1970年增加到15次，1971年多达24次，1972年达42次。其中，专门关于《参考消息》的指示、批示和谈话，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指示、批示和谈话，突出强调要全面、客观地反映情况。比如：

周恩来1970年9月2日批示：“（现在）《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1971年6月22日批示：“《参考消息》刊登外电，最好用原标题，让群众自己来判断不是更好吗？”

1971年10月7日批示：“《参考消息》从今天起标题一概不要有倾向性，完全客观，毛主席说过多次。”

周恩来对《参考消息》报的出版发行和版面编排也非常关心，并给予具体指导。突出的如：

1970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参考消息》报扩大发行到基层党支部，这是改报以来扩大发行幅度最大的一次，整个工作是周恩来牵头进行的。这次以《中共中央通知》扩大发行的权威方式，大大放开了《参考消息》报的订阅范围，有力地冲击了担心基层干部看了会产生消极影响的保守思想。

1971年春天，周恩来从政治着眼，提出并亲自指导《参考消息》报对版面编排作了重大调整和改进。他当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参考消息》编排有些问题，一个时期应一个重点，……你们有时把重点打乱了，容易把人家对我们的反应插进去，例如卫星上天。这样不太好。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喜欢听别人说我们好听的话，因此放在前面。今后一般把重点问题放在头版，……至于对我们的反应，可以登在第四版。”

版面按问题的重要性编排，对于纠正当时“参考”报道中反映出来的“以我为中心”、“唯我

独革”和“喜欢吹嘘”的思想，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在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详细地介绍了《参考消息》报，并送给客人一张报纸看。周恩来说：《参考消息》“转载各个通讯社与世界大问题有关、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稿件。不更改一个字，也不加评论。不是像其它国家那样，……也许在标题上有倾向性，那是编辑加的。我们不赞成这样。要原封不动。让我们的人民自己去判断，培养其判断能力，……就是说，不要把外来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舆论，使我们的人民不知道。这样，他们就不能辨别是非好坏了。”

由于周恩来亲自指导、大力纠正参考报道中“倾向性太大”的问题，所以在“文革”那样不正常的年代，《参考消息》报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外界对中国的反应。

周恩来指挥特殊报纸 发挥特殊作用

周恩来非常重视而且非常善于发挥《参考消息》报的特殊作用。

同美国缓和并发展关系，是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中关键性的一环。为此，周恩来殚精竭虑，花费了很大精力。其间，他在利用《参考消息》报道服务于党的重大战略行动方面，树立了一个绝佳的范例。

1970年10月1日，周恩来特意安排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旁。这是向美国白宫发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然而，当时尼克松、基辛格等未能领会这一“高超的暗示”。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先后会见斯诺，并分别同他作了长时间的、极为重要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和国际局势等许多重大问题。斯诺征得我方同意后，在1970年12月13日的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国际部分，1971年2月28日的《时代》周刊又发表了谈话的国内部分。随后，于4月18日发表了《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的另一篇重要谈话，斯诺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特意

在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斯诺另外三篇访华文章，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先后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

新华社从1971年4月下旬起陆续收到意、美报刊发表的斯诺访华文章。《参考消息》报于5月2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出《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5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我跟斯诺的谈话，一次讲国内问题，一次讲国际问题，两个稿子可以发表，登在《参考消息》上。毛主席接见斯诺后，斯诺写了文章，在外国登了，全世界都读了。我们把它摘要登在《参考消息》上。现在《参考消息》有四五百万份。如果不够，各省可以加印，加印100万份。各省如何分配，你们自己去计算。总之，各支部都要有《参考消息》。对照来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

6月7日，《参考消息》报在头版刊出《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国际部分）》。之后，编辑部接到暂停刊登其它几篇斯诺访华文章的通知，要求编好后一齐送周恩来审阅。这使编辑部的同志们更加意识到发表斯诺访华文章的特别重要性，同时觉得周恩来可能不满意对已刊出的两篇文章的处理。

6月16日早晨6时半，通宵达旦工作尚未睡眠的周恩来写信给新华社参编部：“毛主席已批准你们16日起每隔一日发表斯诺的文章一篇。我把次序改变了一下，摘要文字，我均已看过。现将摘要本给你们退去，请予照此印发。第六篇已在6月7日（也就是上星期四，4544期）发表过，可不再发。其他除第一篇不再改外，如再要修改，当由外交部主管司章文晋通知你们。”

6月19日刊出的斯诺文章《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内容极为重要。在同斯诺长达5小时的交谈中，毛泽东谈了包括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其他一些问题、中国的形势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

关于“文革”和国内形势，斯诺报道：“主席批评了对毛‘个人崇拜’的专讲形式的做法”。“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

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 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当斯诺说到“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时，“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毛泽东还对斯诺谈了“文革”中的冲突发展成打派仗、武斗，中国确实大乱了，表示对这种情况甚为不满。毛泽东还说：“文革”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另一个是虐待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

毛泽东在这一谈话中，不指名地严厉批评了林彪一伙的行径，公开表示了对当时的“副统帅”的不满。如此重大的表态，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首先由《参考消息》报向全国披露，使这张特殊报纸承担了一项特殊的重大使命。《参考消息》报刊出这篇谈话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毛泽东在两次同斯诺的谈话中，关于中美关系谈得最多。他向斯诺谈了一些动向情况，并作了分析。毛泽东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并将高兴同他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披露后，尼克松很快作出反应，表示很想访问中国。

在周恩来精心安排《参考消息》发表斯诺系



196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同新闻工作者在西花厅院内漫步

列文章的同时，中美正通过秘密外交途径接洽和安排基辛格访华。《参考消息》报6月27日登完斯诺访华文章的最后一篇，不几天，基辛格就来亚洲访问，并于7月9日突然在巴基斯坦“失踪”，直到中美发表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后，外界才恍然大悟。《公告》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国政要和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给予很高评价。《参考消息》报及时选登了一些反应，但周恩来认为很不充分。7月17日，他批示：“《参考消息》对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的反应登得太少。对《公告》的反应要大量报道，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登。当天登不完，第二天可接着登。”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于2月27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由于有了对《公告》反应的实践经验，《参考消息》报对尼克松访华及“上海公报”的反应报道，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很好地贯彻了“及时、充分、客观、全面”的八字方针。

在周恩来指挥下，《参考消息》报在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报纸的特殊作用。

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紧接着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美《联合公报》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各界反响强烈。新任首相田中角荣一上台，就发表声明，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机正在成熟”，“我们要认真地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周恩来在及时作出回应的同时，指示《参考消息》报刊登关于中日外交信息的报道。1972年7月8日，周恩来批示：“日本《朝日新闻》文章《准备响应复交谈判，周总理传话给田中》可登《参考消息》。”9月22日（田中访华前三天），周恩来又批示：“田中角荣同记者的谈话，今天登《参考消息》头版头条，横贯。”9月25日田中访华，周恩来在24日就批示：“田中访华的反应（日方、日在野党和各国的反应）不登报，一律登《参考消息》。”在周恩来指导下，《参考消息》报在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报道中，又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许多独家新闻。

对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参考报道，周恩来经常给予指导和督促。他还把外报外电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评论，批示给《参考消息》报刊登

（仅1972年就有三十多篇），并对刊登的版面、位置、标题字体及字号大小都作了具体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认真阅读 《参考消息》报并给予很高评价

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重大战略行动时，把《参考消息》作为全局中的一个棋子来调动；在平时，则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使广大党内外同志经受锻炼的重要阵地。他们对《参考消息》报每天必看，而且是认真仔细地阅读。新华社的几位老领导在五六十时代，曾目睹两位领袖手拿放大镜，或带着老花镜吃力地阅看《参考消息》报的情景。他们晚年病重住院，在病榻上仍由《参考消息》报相伴，或自己阅看，或请工作人员念给听。周总理在去世前三个多月，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但在病榻上仍仔细阅看了9月1日—4日《参考消息》报连载的港刊文章《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并批示有关负责人：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语末了，周恩来连写了四个“托”字，从笔迹看，批语是颤颤抖抖写成的。据记载，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在《参考消息》报上写的批示，也是他利用《参考消息》指导工作的最后一次。

毛泽东在临终的前一天（9月8日）下午，由于早已不能讲话，乃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划，先伸出三个手指，随后又伸出两个手指。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那几天很关心日本政局，分析“三个手指”和“两个手指”会不会是指“三木”和“福田”，就问主席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派和福田派的斗争情况？毛主席点头示是。于是工作人员就把《参考消息》报上有关的报道读给毛泽东听，他老人家流露出满意的表情。

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多次自豪地向外宾介绍出版《参考消息》报的目的、编辑原则和发行情况，对这张特殊报纸给予很高评价。1971年秋天，周恩来在五次会见外宾时主动介绍《参考消息》。他说：“现在世界上有最好的一种报纸，就是我们的《参考消息》，它把那么多的消息有选择地登在一张报纸上，这是哪个国家也没有的，许多外国朋友都称赞。”

（责任编辑 林 跃）

张闻天总书记任内的最大贡献

□ 张培森

近些年来，作为中共党史上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已经广为人知。然而遵义会议后他在党内负责期间，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民抗战所做的重大贡献，至今却鲜为人知。遵义会议诚然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路线的转变还只是限于军事方面，而事实上政治路线的转变则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今日看来，如若没有后来政治路线的转变，恐怕就连前面的军事成果都难以巩固，更难谈得上后来政治上打开新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闻天后面的贡献就更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历史表明，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三年，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和发动全民抗战关键的三年，也是中共为后来夺取整个抗战胜利奠定基础的三年。然而不应忘记这三年也正是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三年。从笔者编辑他的文集和年谱过程中所接触的档案资料来看，这位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三年期间最重大的历史作用，就正是表现在推

动党的政治路线和围绕政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转变上面。这里仅举其突出的四项。

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0月22日在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到达陕北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讲了话，而张闻天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战略转变问题。他说，长途行军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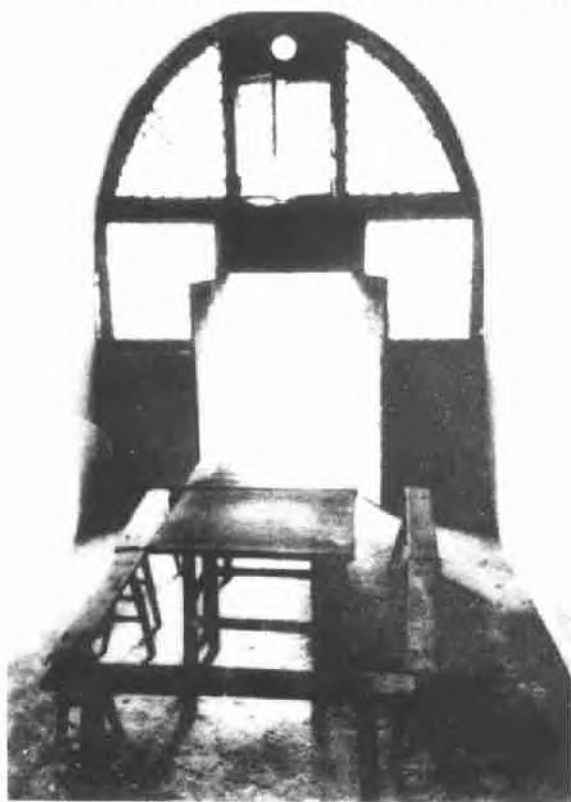
“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这段话值得注意的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从世界形势来说，这里作出了一个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见，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事件就发生在1935



张闻天

年10月，而张闻天随军长征刚刚落足陕北的当月，就抓住这个事件，作出了对世界形势发展的推断，可见这位领导人思想的敏锐和眼光的远大；第二，从世界看中国，联系这个事件他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一是日本加剧侵华的必然趋势，二是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在对华方针上将会发生变化；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向红军官兵提出一项重大任务，要从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且是把它看成一项标志新时期开始的任务。这就实际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战略转变问题，为新的政治路线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但是，陕北根据地当时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还是国民党的“围剿”。打破“围剿”，保卫苏区，红军方能立足。为此，11月3日中央在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军南下去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图为会议会场

剿”；张闻天、博古等则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直到前方战事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央的第四天，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才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内召开。过去说到这段政治路线的转变，人们只知道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议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却不知道会议的由来。

事实上还在前方毛泽东紧张策划直罗镇战役的时刻，张闻天已经在后方沿着他本人所提出的战略转变的思路，着力思考如何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问题。他在11月17日，也就是进驻瓦窑堡的第七天写的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形势，指出：现在，“在全中国民众中间，不但在工人、农民与士兵中间，而且在中等社会甚至一部分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中间，存在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蒋介石的极大不满。”面对这种形势，文章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节，怎样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文章还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反日的教训，认为那时“由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以至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各个击破”。从以上这几段话可以看出这位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不仅当时已经看到了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而且在正确分析形势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抓住了战略转变的中心环节，并把运用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到了全党中心的地位，从而也就为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描绘了最初的蓝图。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张闻天10月22日讲话和11月17日文章的论述，迄今就笔者所见，也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领导人谈政治路线转变问题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也就说明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传达到陕北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初步对国内大变动的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从战略转变的高度提出了运用统一战线的问题，而这应该说正是中共走向成熟的表现。

时机的巧合，就在张闻天上述文章写成后的一两天，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找到陕北党中央。张闻天在与他彻夜长谈，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之后，便立即写信通报前方，并估计到敌人三次“围剿”已经终结，于24日与博古一起致电毛泽东，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接着草拟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口号及纲领”，送毛泽东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12月2日复信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这里所拟的新的策略路线内容，实际在他12月1日撰写的一篇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抗日宣言》的公开文章中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文章特别指出：“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为此，“要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文章再次强调：“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正是根据以上的指导思想，他亲自着手中央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中央作出包括改变对富农政策在内的若干纠“左”的重大政策决定。而所有这些都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时，会议已基本准备就绪，15日决议草本便刻印出来，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便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民主气氛比较好，毛泽东12月19日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据会议参加者回忆，会议讨论中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同博古就在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分析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而主持者张闻天在听取了他们的争论之后，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会议于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在民族危机加深，和以“一二九”为标志的民族救亡运动新高涨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它为党制定了一

条新的政治路线。而这次会议的成功应该说是张闻天的一大贡献，所以，毛泽东那时称张闻天为“明君”，虽为戏言，但也并非是凭空而出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最先提出 和平解决的正确思路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形成，实际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历史表明，其中对蒋介石的争取，既是实现这一方针的难点所在，也是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一方面中共积极推进“逼蒋抗日”方针，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仍在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以至激起全国民众极大不满的情况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事变消息传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之初，红都上下一片欢腾。就在事变第二天（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要求“除蒋”、“审蒋”的意见首先占据了上风。持这种意见的领导者们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出于感情因素，因为蒋氏被拘在客观上容易给人们造成印象，似乎蒋已完全孤立。而这时如果在西安成立抗日的政府似乎也就可以得到广泛的支持，从而经过努力可以争取建立起排除蒋介石在外的抗日统一战线。可贵的是张闻天却在这次会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发表了独持异议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发言是在听取了会上主流派的意见，特别是最后听了张国焘公然恢复“抗日反蒋”，并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极左口号之后讲的，故其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这篇发言开始对这次事变的性质及其前途作了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实际就是指明张学良的这次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其方向是“全国性的抗日”。这里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其所估计的发展前途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张闻天这篇发言的核心是谈对策问题时如下的这段话：

“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这里不仅没有任何“除蒋”、“审蒋”的含义，而且提出在两“不”（不与南京对立，不成立对立政权）、两“争取”（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这是同事变前党中央早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相一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言指出“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点。很清楚，当时能代表南京政府正统的，显然非蒋介石莫属。这就不仅表明张闻天不同意“除蒋”，而且表明他把蒋不是看成孤立的个人，而是同代表着南京政府“正统”这一复杂问题相联系的。首先是要保住蒋这个“正统”，然后才是“联合非蒋系队伍”。这是一条与“除蒋”、“审蒋”相反的处理事变的思路。

发言还不无隐忧地劝告大家：“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要“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最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张闻天以上对事变性质的估计和“争取正统”方针的思路，不久就得到事实证明它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的当晚，张周一开始会晤时，张学良就当周的面讲了他发动事变的本意是争取蒋抗日，而且认为现在最有可能。另外从全国的反应来看，本来我们一些同志估计各地国民党实力派会支持或响应西安事变，然而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一股相反的“拥蒋潮流”，同时南京政府内出现了微妙的斗争，即亲日派叫嚷要轰炸西安，讨伐张杨，而英美派则渴望和平解决。局势的发展明显表现出对蒋处置问题成了“和”、“战”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有酿成一场更大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态度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此周恩来17日当场赞成张学良主张的谈话成了开始扭

转局势的起点。如今世人皆知17日周恩来见张学良时的这次重要谈话，却很少有人知道张闻天在此之前作为中共党内总负责在党中央会上的主张，以及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再起内战危机时刻，张闻天又为克服危机亲赴西安与周恩来共商大计的事。

主持洛川会议，为持久战的 战略思想的形成作出宝贵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在中华民族开始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这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后一次确定抗战路线方针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然而张闻天不仅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也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发言，这也是过去人们很少知道的。

张闻天报告的主题是形势与方针问题，而发言则是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讲的。贯穿整个报告和发言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了持久战的问题，现在仅从会议记录来看，他说到持久战的问题就不下七处。他明确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也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与退守”，要看到日本的弱点却正在于“他不能实行持久战”，而中国，“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

他之所以强调持久战，是充分估计到中国的国情，包括国共两方面的实际状况，而把胜利的根本立足点放在全民的发动，把胜利前途的争取放在中共的领导作用上。当时有些人对于正在进行的上海国民党的抗战寄予很大希望，而张闻天则估计“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他认为国民党抗战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不愿意发动

全国人民来抗战，“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也“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

由于他把握住了持久战这个大的战略思路，因而在他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报告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作了有力的论证：正是因为“抗战是持久战”，“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针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

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我们也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最后提高信仰！”

需要说明的是，从会议的记录来看，张闻天8月24日报告关于持久战的强调和论述，当即引起了会议的热烈讨论，在他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意见。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正是集中了大家讨论的意见，确立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张闻天对中共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张闻天之所以能在这次会上如此提出并强调抗日持久战的问题，看来也不是偶然的，早在此一年多之前，即1936年4月20日他在所写的《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迄今所见，这是陕北时期党中央领导人提出关于抗战是持久战这一明确命题文字的最早文献之一。

排除王明错误干扰，同毛泽东一起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的抗战正如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时的合影。左起，前排：项英、何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

张闻天所预料的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山河破碎，中华民族正在遭受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在这个严重关头，作为中共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向广大党员发出号召：“共产党员要在一些人们开始为失败与困难所动摇而悲观失望的时候，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中流砥柱’。”也就是这篇文章，公开提出了中共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这就是在国民党军溃退华北，太原失守，山西国民党抗战的正规战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则要“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应该说这是贯彻洛川会议精神的一个不失时机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就在此时，久在国外的王明回到了中央，洛川会议的贯彻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干扰。

王明11月29日回到延安中央，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会上首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形势，讲了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这些成绩“证明我们上次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笔者按）的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还特别指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张闻天报告之后，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发言许多地方明显是

针对报告的，发言实际指责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王明回国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又声称他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造成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会上惟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而张闻天最后所做的总结性发言，虽然对王明所指责的所谓“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些检讨，但在原则问题上同样没有动摇，而是同毛泽东站在一起。他认定说：“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还说：“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对抗战方针、路线重作新的决议。

然而要看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并没有完全排除，而其危险是很可能造成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有利时机的丧失，那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可贵的是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发现的档案材料来看，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之后，明确表示反对王明干扰独立自主方针错误的讲话最少有如下两次。

一次是“十二月会议”后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总的结论”。他说：“我们虽然目前主要的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然而今天不是在于这样说说，而是如何实际去做。”这里不是一般地说到扩大，而且提出了具体目标；不仅提出了目标，而且强调了实际去做。另一次是在1938年2月28日有王明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许多观点都是针对王明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指出：“在党的力量的使用方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不要平均使用党的力量。”“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

且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这里不仅强调了党的力量的使用重点，而且在总结前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如何使用力量的具体办法。事实上后来大部分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发展和扩大起来的。

王明错误的干扰还给中央造成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中央正确的指令不能以统一的名义发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闻天坚决同毛泽东站在一起，许多发往敌后的重要指令，包括1938年4月连续发出的《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和《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都是用他们两人个人联署的方式发布的。正是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和指导下，从1938年至1940年，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大批的敌后抗日武装终于在中共的领导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真正成了打击日寇、坚持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对于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在“文革”中也都还没有忘记，他在九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张闻天时还说：王明回国后他（指张闻天——笔者按）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历史贡献自然不只是以上四点，然而这四点正是说明他作为党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在重大战略转变时期，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方向，紧紧抓住贯彻正确路线的中心环节。因此可以说这是他在总书记任内最大的历史贡献。毋庸讳言，张闻天30年代初期确实犯过路线错误，然而应当看到那时他所犯的错误毕竟是在共产国际错误路线能够直接控制中共，而中共就全党来说又尚处于一个不成熟时期所犯的错误。可贵的是，张闻天不仅后来能够通过实践自觉地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而且能在总结过去错误的基础上，为新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因此全面客观地来看张闻天30年代功过，应当说他功大于过，而且不愧是中共历史上一位推动战略转变的历史伟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路线的奠基者之一。

（责任编辑 洛松）

珍贵的笔记本

——毛泽东为于江题词

□ 申 春

说这笔记本珍贵，我想主要是上面有60年前毛泽东的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题词是毛泽东用毛笔书写在于江笔记本上的，言简意赅，极富哲理。笔者现就这笔记本征集过程引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这要回溯到1985年。当时，我在河北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为了“抢救”党的历史资料，我的足迹遍及全国许多地方。例如，为了征集于江烈士生平史料及遗物，我曾先后在北京访问了外交家王国权、老将军罗元发、已故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薛明告诉我，于江的爱人任致在西安，你一定要去拜访她。

1985年初夏时节，我在解放军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病中的任致同志，她欣然拿出从延安珍藏至今且完好无损的只有十几页的笔记本，这是于江生前专门用作请别人题字、同学临别赠言的，笔记本上除毛泽东的题词外，还有艾思奇、郭林祥等用钢笔写的赠言，还有于江的同学于振海写的催人奋进的歌词：

“黎明即起，自强自立，岁计在春，日计在晨，空气鲜，精神振，男儿起舞在鸡鸣；刻苦奋斗，决志尽忠，团结对敌，协力同心，报国仇，雪国耻，做民族复兴的先锋。”

任致思维清晰地谈了许多她和于江在革命斗争中结成永恒友谊的往事。

于江，河北沧州人，1914年生。1935年就读于天津高级中学，其间与任致相识，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又同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于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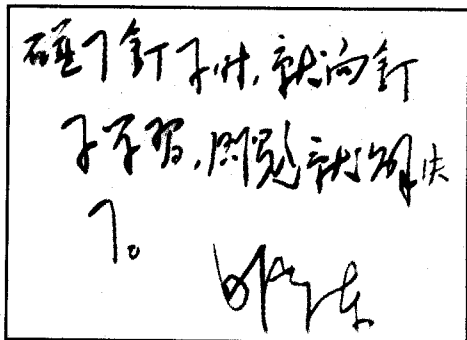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前夕，于江同任致、薛明等十几个同学到南京，又转赴西安，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他们到延安去。经过十几天徒步

行军到达延安，于江进入抗大学习，任致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于江同任致结婚。婚后，党组织安排他俩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其间，彭德怀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动员学员到前线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不几天，组织上通知于江和任致，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临离开延安前，他们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大意是：“你们到敌后去工作任务很重，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更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的讲话使于江和任致深受鼓舞，报告结束时，于江拿出笔记本走到毛泽东面前，毛主席欣然挥毫，写下了这寓意深刻的题词。

1940年3月2日，时任中共河北定兴县委书记的于江，带警卫员王炳文、李嘉银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被一帮乔装成“抗日干部”的武装匪徒抓捕后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以上就是于江烈士这个珍贵笔记本征集的概略情况。为慎重起见，我曾带着有毛泽东题词的笔记本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有关专家作鉴别，他们确认这个题词是毛泽东的手迹。献出这珍贵笔记本的任致同志于1986年4月在西安辞世。这使我深深感到“抢救”革命文物是何等重要。于江烈士这笔记本，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必将和他的业绩一起长存人间。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胡绳为邓小平理论鼓与呼

□ 余广人 胡 申

胡绳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理论家，他的作品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994年6月为《胡绳文集》所写的序中说：

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并不后悔。

与胡绳相知甚深的王梦奎评论说：“这并不是说，胡绳鄙薄和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纯学术的研究和文章，一切科学探索都是他所重视和欢迎的，他的著作正因为具有科学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某些‘纯学术’，才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战斗作用；而是说，像胡绳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并且终生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择的武器，正如战士之持枪。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指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

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作为党内资深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的胡绳，抱着“要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的目的，热情讴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



1996年9月在全国政协“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首次会议演讲

立的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诠释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尤其在改革开放遇到“左”的理论干扰的时候，胡绳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文章，阐述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在“左”的力量和“姓资姓社”争论甚嚣尘上

的时候,他的文章弘扬了邓小平理论,澄清了理论界的一些混乱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这次
会议结束后不久的第三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明确的结论: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如何理解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呢?作为理
论家的胡绳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它与历
史上的遵义会议是相同的。在80年代,胡绳曾
在讲演和报告中,多次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对
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转折意义。在《党的十
二大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他在谈到三中全会的
历史意义时认为:“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
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
统,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
因为具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从思想路线、政治
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
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的观念”。

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任主
任)出版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这本书中,
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
冠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题。在
这个标题下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徘徊中
前进”;第二部分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
这种分期方法,胡绳作过思考。当然,他所考虑
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将
着眼点放在通过分期来体现三中全会的历史意
义。他曾找到几位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
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三中全

会以后两大时期。三中全会以前可以按《历史决
议》分成几段,三中全会以后也可以分成几段。
谈到这样划分的原因,胡绳指出:“以上说的分
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
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历史地位突出出来。”

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新时期的遵义会
议,从历史的高度是否说得通呢?1976年10月
粉碎“四人帮”,使“文革”的结束成为可能,当然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徘徊中
前进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表明,“文
革”结束后,工作如何向前推进,在当时也是我
们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从这样一个
历史高度出发,胡绳认为党面临着两种选择: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一切做法完全回到
“文革”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所
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
过程中的错误。“文革”结束时由于当时的主要
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恰好是把过去错
误的东西凝固化。如果这样走下去,只会造成比
“文革”以前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文革”结束后
如果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显然是对中国非
常不利的。

另一种可能是,总结历史经验,按照中国的
实际情况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说,吸取以
往的经验教训,把有价值的经验接受下来,避免
重犯过去那些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实际
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
过的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我们党确实如同遵
义会议召开前一样,同样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局
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

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邓小平语),实际上是阻止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种局面的倾向。据此,胡绳以遵义会议后中国的历史的发展作比较,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6年(胡绳的讲话是在1994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他指出:

这样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源头。高屋建瓴地评价这次会议的地位,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在我党历史上地位的评价,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国策的坚定拥护。胡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这次会议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胡绳的观点发表后,在思想界、理论界以及党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总结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教训,阐发邓小平理论

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胡绳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发人深思的话: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

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

胡绳的这段剖白,无非两个意思,一是不讳言自己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的困惑和失误,从而进行反思;一是对当时“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的憎恶。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后,胡绳赋诗自云:“老遇明时倍旺神”,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将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阐发,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上,同时又对历史上“左”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鞭笞。

人们知道,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行,在思想界、理论界并不是没有阻力的。一些抱着“左”的思想不放的理论家们,对改革开放的国策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不断地在理论界制造混乱。胡绳对这种倾向是具有高度警惕的。1983年,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长篇理论文章,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讲到危及党和国家“左”的错误时,胡绳以马克思在1877年的一封信为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左”错误的表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时说:“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

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胡绳在引用了这封信后,提醒人们对“左”的错误表现形式加以警惕。他指出: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所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

在1987年,针对理论界刚刚萌芽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胡绳在

《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长文中,借列宁的观点加以澄清: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联系到在1989—1991年期间甚嚣尘上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胡绳所谈到的问题是有预见性的。

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危及到改革开放的路线的时候,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回答了几年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胡绳就在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所、局级干部读书班上发表了《关于防“左”》的



1990年2月江泽民、邓小平等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前排左三为胡绳)

长篇讲话,开宗明义地说“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当前防‘左’,防什么?二、为什么产生‘左’,怎样防?”关于第一个问题,胡绳说,“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挑起这场争论的“左”的理论家们的武器,其目的是以此来冲击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关于第二个问题,胡绳说:“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针对“左”的理论家所挑起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胡绳指出: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

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所以事情不是问姓“资”姓“社”就能解决了的。邓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

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利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在这个讲话中，胡绳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谈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时，他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所以我们不能说“左”比右好。还是邓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

正确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

1998年12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20年历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策是正确的。在这纪念日到来之际，作为理论家的胡绳，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来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

这篇文章，与胡绳的其他文章比，篇幅相当短，但文章所提的问题却相当大。在这样大的题目下，作者论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的三种看法。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历程时，胡绳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其根据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张在建国以后要用10到20年的时间，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至少也要这样长的时间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

本主义”，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照这一方针来实施建国方略。尤其是到了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这一方针就更被领导群体所淡忘（刘少奇因为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被迫作了检讨）。于是，出现了胡绳所概述的这样的现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步伐”，“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胡绳认为：上述这种种现象，“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样的认识才符合实际，才不有害于社会主义呢？那就是邓小平的理论。胡绳指出：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們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 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笔者不惜篇幅引用胡绳的这些话,是因为胡绳的观点曾被有的人误解为“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其实,从上述引文看,这样的误解实在是不应该产生的。

以笔者的愚见,胡绳这些话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前面曾提及,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确有一些人不是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看问题的,总是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甚至有人撰文公然否定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声称对任何事物都要以其性质作为评判标准,如果不问姓“资”姓“社”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并进而断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这样地看待邓小平的理论,显然是与十四大、十五大以及党章、宪法所确立的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相抵触的。笔者以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坚定的拥护者的胡绳,正是因此而提出了上述看法的。其用意当然在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需。而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必须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更不能人为地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或许,胡绳自己也知道“至少要有百倍于此

的篇幅”才能论述清楚这一问题,所以在1999年6月,胡绳就这一问题又推出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进一步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扬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论点出发,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再评价》一文“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胡绳引用了毛泽东在1944年至1948年间讲过的几段话后指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胡绳进一步说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的。胡绳依据《毛泽东文集》所提供的有关反对民粹主义的史料,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阐释,不仅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开掘出新的理论深度。我认为,胡绳论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鲜明地指出了:“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在革命时期重要,而且在建设时期也同样重要。如果不顾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存在条件”,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上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而急于消灭资本主义,“那就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冒险主义、民粹主义、或

别的什么。

为了说明问题，胡绳举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一组数字。在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之后继而指出，至1956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任务，“三改”虽然超前完成了，但“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还远没有达到。继此之后，搞“大跃进”没有成功，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却“继续猛进”。这样，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走过了一些弯路，所造成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

这里所谈到的弯路，是为说明问题而无法讳言的。这不是要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弯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很大关系，批评这些错误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同时，胡绳的这些看法，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这只要看一看决议的论断就会很清楚的。《决议》中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三十二年来主要成就，也指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缺点和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后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对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胡绳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从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存在条件”、从“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角度，探究其深层的理论根源的。胡绳指出：

当农业生产力的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

距离很远。

胡绳提出这一问题，旨在总结1956年前后的经验教训，重新学习、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此为借鉴，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胡绳告诉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则遭受挫折。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肯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要“退回去”的误解，胡绳特意指出：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接受了30年来的经验，也在30年来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然不是回到1949年。只就经济上说，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强；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农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经验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和不应如何做。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胡绳所要阐明的是：绝不能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他认为：“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探讨，胡绳也显示了大家的风范，毫无咄咄逼人之气势，而有与人为善之亲切。很多读者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有的读者这样评论说：“作者以他沉稳、细腻、平和的文风打动读者。作为历史学家，他观察问题能得其全；作为哲学家，他论证问题则得其深。”可谓领略透彻，评价恰到好处。

（责任编辑 程 度）

编者按：《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篇很能发人深省的好文章。作者以通俗朴实的语言，确凿具体的事实和作家特有的对生活细致透彻的观察，叙述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经历，他的困惑、无奈、痛苦和无告中的感悟，使人读来如同身受，而且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看似平实的述说，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本刊破例地分两期全文刊载这篇近6万字的长文。

作者徐光耀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38年，13岁参加革命，当了小八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刻苦自学，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不少反映抗战的报道和文章。1947年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全国解放以后，又进入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深造。著有《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四百生灵》、《少小灾星》、《喜剧系列》等作品。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4年代主席；1986年当选河北省文联主席。现已离休。

昨夜西风凋碧树

——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上)

□ 徐光耀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受多了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准确。

一、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惶

惶地千里行军，迁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迁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大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



1945年10月6日在河北冀城战斗中摄于伪县公署之照壁前

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人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委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

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是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而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

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意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

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嘛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俭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究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免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



红军中的丁玲(1936年在陕北)

“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亲自来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卡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正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准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

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道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过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可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我心上欢

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它,可就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了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个第5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

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誉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不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份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

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 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森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他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太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党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陈企霞

2. 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道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至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能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人的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 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 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未期,她曾两次严厉地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 “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

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值不得骄傲。

3. 也有过这样一事实: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

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自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作参考。

1.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它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很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的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

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是对事情的解决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使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作家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耽

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很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三、“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个个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足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宴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按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好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民齐心向党，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

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运，都使我啧啧艳羡。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去了，发现会场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所以他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曰“肃反”，二曰统购统销，三曰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

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励，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曲一曲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之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曰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这话，说得叮叮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子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议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8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呆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卷》425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四、插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的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让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

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点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他都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做好了发言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事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我这次对陈沂的

“攻击”,既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悄悄地“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玛依第495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盖自北京。8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法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匆匆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

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救人济世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都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悠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松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哎呀”了一声，吃惊地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得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在报上“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

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的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更须及早交待，划清界限。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来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疯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新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啾啾，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

但当时还是不太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蛰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份：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蛰”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利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牵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

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或家破人亡，“曳尾涂中”二十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刘兄善于思辩，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六、军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 64 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觉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50 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

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



冯雪峰

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只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噓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42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会”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天津作协的一位作家，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溪，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

“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在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撼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这位作家列举事

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棐、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这位作家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

“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一批民主人士和知名作家，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辱这些人。当时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情。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园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



艾青

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之外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然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话说：“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

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地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也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逯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糊’！……”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污辱！……”他满脸紫胀，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只好喘着喇叭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逯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逯斐发言，一面观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入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了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逯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糊’？”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

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

主席：

逯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请调查。

徐光耀

把条子交给刘白羽，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糊’？”胡可颇烦躁，只低声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勒，会裱画，人称‘汤裱糊’……”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糊”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剧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么？……

然而，不发言是绝对不行的。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

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往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免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个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待”。他这个“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溪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待的“比柳溪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在“密室”的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等等。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

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高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千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天津那位作家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棐、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天津那位作家说的“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的“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只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掺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责任编辑 徐 孔)

我在国际场合见到的周恩来

司徒眉生

那是1955年4月16日凌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飞机场，漆黑的天空，微风轻拂，远方传来飞机呼啸的声响，一架银色的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人群里一片鼓掌和欢呼，舒缓了原有的忐忑不安，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安全到达了这千岛之国的首都。周恩来英姿勃勃出现在机舱口，向欢迎的人群挥着手走下飞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在这之前几天，载着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另一架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在南中国海纳度那群岛上空突然爆炸，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因而牺牲。后经证实这次空难是台湾当局阴谋策划的。

1955年4月18日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盛会——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宣布开幕了。大会安排所有的29个国家代表团的300多名成员在亚非大道一角的广场下车，步行几百米走向会场，以接受夹道群众的欢迎，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阿里、缅甸的吴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埃及的纳塞尔等等逐一走来，都受到群众用鲜花、欢呼和掌声表达的热烈欢迎。突然人群里起了阵阵的骚动，大家跳跃着，高声叫嚷“周总理来了”，其中许多华人华侨更是激动不已，挥动着双手高呼“周总理，周总理”！只见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以他独特手势向群众举手致意，那堂堂的仪容，儒雅的风度，透着股股逼人

的英气震撼着人心，使我当时心中顿感他是多么的可敬和可亲。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并不理解，普遍还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与会各国之间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甚至出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这种环境和情况中，中国代表团所面临的挑战、压力和艰难可想而知。我以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在会场高处观察着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只见周恩来和陈毅、廖承志、黄华、乔冠华、叶季壮、章汉夫、杨奇清、陈家康、达浦生、王卓如、浦寿昌等都在聚精会神聆听着每一个代表的发言，并作笔录。告一段落时，彼此聚首商议，在会场内外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和各国代表接触交谈，又进行了许多单边和多边的会见和会谈。在整个亚非会议前后，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

周恩来根据对会议发展情况的观察，决定在4月19日上午先散发了书面发言稿，又在下午的大会讲台上作了影响深远的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是求同存异的，……这个会议反映了我们当中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是不相同的，我们也曾为此进行了部分的讨论，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我们彼此间达成共同的协议，而且会议也开始了或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今后的

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会议是有成就的。”

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又就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局势问题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症结在于美国的粗暴干涉。当时作为《新报》的政治记者，我们以第一时间用整版篇幅对大会的进展情况和中国的立场作了详细而积极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黎巴嫩代表团成员，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在会见周恩来时，似有意为美国“刺探军情”，大谈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阐述了台湾问题的背景，举了朝鲜战争的事例说：“我们曾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超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是不要战争的，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再次严正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马立克最后不得不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甚至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们却同你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消失了。在会议上别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成功，但你却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周恩来在会场内外，让每一个人都深深感染他迷人的魅力，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谋略，既坚持原则，又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使对手最终都愿意“存异”而“求同”。

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万隆的华人华侨代表千余人，为欢迎周总理和庆祝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种充满激情的热烈场面是令人难忘的。接着周恩来又应邀回到雅加达，对印尼进行了两天正式的国事访问。在万隆和雅加达虽然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当时作为记者，只能在集体访问时问上几句话。4月27日在雅加达参加了午间和晚间都在中国大使馆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这是他在招待会上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右二）、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右一）交谈

举行的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当有苏加诺总统参加的官方招待会结束时，他把我们一些记者留了下来，简报了4月22日在万隆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的“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他说两国间一个由长期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问题，已经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他语重心长地要我们多做华侨的工作，劝他们为了长期生存发展的目的而抛下历史的思想和感情包袱。那一晚他就各项重要问题和我们谈到夜深，这是他到达印尼后和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次。翻看搜集回来的相片，参加的中方人士有黄华（原外长）、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彭迪（原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主任），印尼方面除我之外有国营安塔拉通讯社社长查禾多（后任亚非记者协会书记，印尼驻华大使）、雅加达新报资深记者黎瑞格、生活报编辑郑曼如、记者李宏桂。

在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和在印尼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周恩来表现了无比的魅力和高超的谋略，他把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扬光大，这些原则直到现在都是国与国交往和其他领域交流中的不朽基础。

和印尼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则为散居世界各地，特别是聚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社群，为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在当地生存、生根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二

一年以后，为筹备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的历史性大事，我应苏加诺之邀到他身边工作，暂时离开了新闻记者的岗位。从此，自1956年到

1965年的十年国际交往、会议、会谈等外交活动中，和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有了很多直接的接触。

1956年9月30日的北京，正值秋高气爽的好时光，作为印尼总统访华团的先遣人员，我已先期到了北京，参与正式访问的准备。中午当专机在西苑机场降落时，我走向停机坪，只见人群、鲜花和彩旗像潮水般汇集，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敲锣打鼓，天真无邪的儿童跳跃着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时人群突起轰动，原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都来了，后边还跟了不少穿着崭新制服的将军们，周恩来看到了我们就急步走过来和我紧紧握手，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并且告诉几位手持束束鲜花的小姑娘们说：“这些都是印尼贵宾。”漂亮的小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纷纷上前来向我们献花，接着他又把我们向站在近处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逐一介绍。他对毛泽东说：“他们都是我们在万隆会议时认识的朋友，在会议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切微笑，和我们紧紧握手说：“那要谢谢你们啰！”接着大家就闲话家常，既问问我们个人、也问问印尼的情况，直到苏加诺总统到达后，大家又奔向前方，海啸一样的欢呼和鲜花的巨浪淹没了一切。我作为随员，陪同苏加诺开始了他长达两星期的国事访问。

当时北京还没有像钓鱼台那样的国宾馆，印尼代表团被安排住进中南海的勤政殿和北京饭店。我原希望住饭店可以自由些，但却被指定住进勤政殿，对面就是清朝末年历史上有名的瀛台。苏加诺到达那天下午就开始了紧凑的活动，先是在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主席，又立即应邀参加了毛泽东在丰泽园举行的家宴。席设两桌，主座上的是两国的少数领导人，我们被安排在次席，依稀记得主方有汪东兴、田家英、杨德中、徐涛医生等人，客方只有总统副官长苏于地和我两个人。周恩来在席上劝饮，原本苏加诺不喝酒，只见他兴高采烈地把酒喝干了。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高高兴兴地过来和我们作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还从书房里用毛笔在绫纸上签了名送给我。

作为访华的总统随员，我原来只担任私人秘书的工作，有一天，苏加诺突然在勤政殿早餐桌上提出要求更换演讲时的翻译人员，并且指定要由我担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口译工作的经验，而众所周知，苏加诺讲话全无讲稿，但可以滔滔不绝讲上一、两个小时，他博学多才又博闻强记，讲话时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是世界公认的演说家，作他的即场口译的确是难度很高的。

第一场由我现场翻译的演讲是在清华大学体育场举行的两万多师生参加的大会上，翻译完之后，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便向苏加诺请辞，请他另选贤能取代我当翻译，苏加诺听后和藹地凝视我片刻说：“你看看台下群众的热烈反应，就知道他们不但听懂了我的讲话，并受到了鼓舞，你这第一次已经算是合格了，连陈毅都说你翻得不错。”苏加诺的赞扬和肯定使我从此多了一个衔头——总统私人中文翻译，以后凡是他在与中国有关的演讲和会议会谈上，我都是他的专用翻译。

就在清华讲完的当天下午，苏加诺又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在刘少奇委员长讲话完毕，苏加诺应邀讲话时又不得不披甲上阵，由于这是一次政治性较高较强的聚会，他大篇的叙述了亚非各国被压迫，引致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和看法，并引用了大量的经典和涉及了许多的事件和人物，当他讲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匆忙间我却翻译成日苏战争，这时台下一个尖锐的声音高呼是日俄战争，不是日苏战争，我停下来向台下望去，原来是周恩来纠正我的错误，我即刻意识到失误，连忙将此段话重译一次。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向我走来，在苏加诺身旁拍拍我的肩膀安慰地说：“你今天翻译得还算不错，但刚才那次可是原则性的错误，当时苏联还没有建立，日本是在和俄罗斯开战。”我说：“谢谢总理的指正，以后我会力求准确。”此事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从此养成了严谨、谦虚和务求准确的工作作风。在北京的七天访问中，我们有和周恩来相聚和谈话的许多机会，使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62年9月,我奉苏加诺之命,陪同他的夫人哈蒂妮女士率领的部长夫人访问团,在访问了柬埔寨、越南之后,又到中国访问而来到了北京。飞机降落后,从机舱的窗口就看见欢迎人群中周恩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等人,在北京的几天里,无论是参加多次盛大的宴会和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在西花厅所设的家宴以及国庆招待会等场合,都一再和周恩来见面谈话,而每次谈话,都让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敬佩。

1964年11月初,苏加诺在访问了日本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后,在回国途中应周恩来邀请在上海停留一夜,就关于东南亚新形势、亚非会议十周年庆典和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重要问题进行会谈,在锦江贵宾楼的会谈,参加的人数并不多,中方除周恩来外,只有副总理罗瑞卿、外交部的章文晋等,印尼除苏加诺外,也只有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驻华大使查禾多等,会谈非常认真和紧凑,使我们都没有时间作私人接触,当时作为外事助理的我,由于要赶着处理文件,在会议厅参与作好安排后并没有参加会谈,直到举行宴会时才有机会和周恩来以及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等人畅谈。

1965年4月16日,恰恰是1955年4月16日十年后的同一天,周恩来和越南的范文同总理一行又飞抵雅加达机场,这次是为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而来。在全城亚非各国国旗旗帜似海的气氛下,当天他就投入到繁忙紧张的政务外交活动中,先后会见了先期到达的金日成等人,又由陈毅陪同和苏加诺、西哈努克举行会谈,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谈,第二天又和陈毅及夫人张茜等人前往茂物总统行宫正式拜会苏加诺和夫人哈蒂妮、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也来到了这里,当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一行在苏加诺和夫人陪同下,漫步走到紧挨着总统行宫后花园的著名的“茂物植物园”,在漫天遮阳大树庇护下,茂物更显得比雅加达凉快,空气也清新得多,西哈努克说来到了这里真令人精神振奋,一行人环绕

着满布清丽的大睡莲的池塘一周后,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是一棵有名的红豆树,它结的小果粒正是小手指般大小、鸡血红似的鲜红晶莹可爱而又坚硬非常的红豆,我俯下身草丛中搜集了十几粒分别交到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夫妇、陈毅夫妇等人的手上,他们细细把玩爱不释手,赞个不停,这时周恩来咏起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句,翻译成法语后,西哈努克就说,手里凝视着这颗小小的红豆,思潮起伏想起远方可爱的恋人,多浪漫呀!周恩来却说:现在我们更应该思念的是亚非拉三洲被压迫的苦难的人民!

4月22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被安排到有名的旅游胜地峇厘岛参观休息,一到登巴沙机场就沉浸在身穿鲜艳的民族服饰、头戴鲜花的峇厘古典舞蹈女郎的欢迎海洋。在峇厘的两天是比较轻松的。各国领导人多是集中精神欣赏峇厘人民为他们所举行的多彩多姿的传统歌舞和大游行汇演,在晚上会聚精会神的欣赏峇厘细腻的舞蹈演出或是白天到大街上选购各式各样的独特的木雕等手工艺品,只有周恩来不辞辛劳,分秒必争地不放过争取和有关的各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仅仅在两天的时间里,他先后和金日成、范文同、老挝的苏发努冯、日本的川岛正次郎、尼泊尔的比兰德拉王储、阿尔及利亚的赛义德、以及阿富汗、索马里、赞比亚、塞普鲁斯等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和会谈。

在峇厘,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在沙努尔海旁的一列别墅群,和印尼商业部长苏治多博士一同作为专责陪同的我,那两天便有较多和周恩来共处的机会,我们在住地共进早餐,晨昏同在沙滩上散步,看潮起潮落,浪花飞溅,闲话家常,是最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时刻,已经夜深沉了,我们看到,他还不休息,依然召集代表团其他人员共同商讨问题,我住在他对面的一幢别墅里,也因为职责所在,在贵宾休息之前作为主方代表还必须打起精神,以防突然有要办的事,两个夜里,我都和衣而睡。经历过那么多的外事和接待活动,我发现作为周恩来的专职陪同是最“辛苦”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第。一次亚非会议时参加的只有 29 个国家,十年后的 1965 年,非洲已有 30 个国家宣布独立,亚非两大洲已共有 60 个独立国,此外还有 20 多个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10 年以前人们都还不大看得起亚非会议,现在却都千方百计想参加进来,这一次会议还没有举行,已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原定在 1965 年 6 月底,7 月初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召开,却因该国一场突发的军事政变使它胎死腹中,这是第三世界、亚非国家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1965 年 6 月 26 日苏加诺率领印尼代表团飞抵开罗,准备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作为随员我也同机前往,当天夜里到达机场时,会前正在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统纳塞尔同在机场欢迎我们,当我们见面时,周恩来亲切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见面格外亲!”

为了研究阿尔及利亚形势突变影响到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举行这一个严峻的情况,三国领导人第二天就在开罗库巴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接着在纳塞尔官邸又举行了有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参加的会谈,后来外长布托又参与了另一次会谈,在各个场地分别举行一连串紧张而密集的会谈。

有一次忙完了大半天,我不愿在饭店呆着,于是不顾 38℃ 高温,来到我们驻地希尔顿饭店对面尼罗河畔的船上饭店,在甲板上呷上一口咖啡,迎着开始西下的夕阳余晖,望着漾漾河水,正在尝试着发怀古之幽情,突然被召速回,原来周恩来推辞了苏加诺准备到共和国宫的会晤,亲自到饭店来探望了。当时中国代表团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宾,而印尼代表团只是准备取道参加会议的“过客”,由于事出突然,我们并没准备,好在只是礼节性的拜会,只好在饭店阁楼的大厅欢聚,场面公开引来了不少游客,住客纷纷在圈子外鼓掌围观、拍照,场面好不热闹,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谦逊友好的品德。

过了一天,纳塞尔邀请了苏加诺、周恩来和两国代表团成员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到一个三角洲有许多大树遮阳的风景区游览,我们除了

尽情欣赏孕育着埃及古代辉煌文明的母亲河两岸的景色,在船上分成一堆堆的在谈笑,暂时忘掉沉重的政务问题。上岸后,在绿荫环绕的三角洲的宾馆前一个大帐篷下,三国领导人在那里谈笑风生,我陪同第一次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原外长阿卜杜干尼,正在不远处的大树下和中国代表团一些成员和陪伴的埃及官员们聊天,谈兴正浓,突然传来周恩来那熟悉的开怀大笑声,纳塞尔、苏加诺也大笑不已,我们把视线望过去,正好和苏加诺的目光接触,他招招手把我叫了过去,当我走近时话题似乎已告一段落,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味地笑,我莫明其妙地站在一旁看看苏加诺,看看周恩来,又望望纳塞尔,一脸的不解,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笑些什么?

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了,通过一连串的重要会谈作为补救之后,苏加诺在开罗机场先送别了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行启程回国,而我们印尼代表团也在第二天离开开罗飞向法国巴黎,进行又一次的非正式访问和休息。

印尼是亚洲主要大国之一,五六十年代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广交朋友,又为争取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而努力,苏加诺曾被称为亚非国家第三世界的旗手,因此国际交往颇为频繁,作为总统私人外事助理,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活动,有幸见到了、协助接待过和直接接触过世界各国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人物,但其中只有一些人的性格和表现比较令人难忘,像胡志明的刚毅和朴实,尼赫鲁的智慧和阴沉,戴高乐的坚定和自尊,赫鲁晓夫的开放和粗野,恩克鲁玛的热情和宽容,布托的机智和灵活,西哈努克的谦逊和有礼等等。但最最使我永志不忘的还是周恩来,除了他全心全意忘我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那些已为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公认的雄才韬略丰功伟绩之外,我更忘不了他那沉稳的步伐,凛然的风神,他那唇边的微笑,微蹙的浓眉和炯炯的眼神,这都已经为他表裹合一的伟大人格作了最好的描绘。

(作者司徒眉生,现居澳门,曾任苏加诺总统私人助理,中文翻译)

(责任编辑 吴 思)

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 邱 健

前十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久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久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

位于芜湖市大戏院 40 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久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 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杌告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溜烟地跑掉了。他很诙谐得意地对我说：“这还是我从电影《地道战》中学来的游击战术呢。”

年广久大半生命运多舛。他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 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再次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怕被“打办”干部逮住，便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度过了多少凄惶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少人都原以为小商贩对政治是麻木的，眼里只装着钱。其实他们在长期的求生

中锻炼出高度的敏感和迅疾的反应力。他们一只眼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升降，一只眼注视着改革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懂得每项政策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年广久开始重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瓜子，年广久这个生意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来。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嗽口再品。年广久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嗑嗑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久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终于把“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1984 年，“傻子瓜子”日产 1.8 万斤，雇工 103 人，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1985 年 4 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在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 VOA 电台

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扬名。

“傻子”的头脑和生意经

全国许多报刊都相继刊登过“傻子瓜子”的报道,可寄来的文章,“傻子”从来一篇不看,也没法看,因为他是地道的文盲,一天学也没上过,总共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意”字不会写,只好写成“甲乙丙丁”的“乙”,不过不识字也难不倒他,目睹不行靠耳闻,他可以从收音机、电视机中感知中央精神,可以靠秘书处理文牍协议。别瞧他不识字,他头脑中装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新奇的见解层出不穷。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要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他还说:“现在中国瓜子市场才开发了一半,没有一个真正的瓜子市场。台湾只有十来个瓜子厂,可面对全世界销售。台湾商人有眼光,他们在江苏淮阴县与农民订约,种了5万亩瓜田生产瓜子,赚了很多钱,我们还在睡大觉,思想没开放,经济头脑赶不上,中央精神就落实不了。”

年广久虽是大老粗出身,目不识丁,但他做生意却鬼灵鬼精。人们问他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经营家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年轻时在瓜果摊当过学徒,跟在老板后头跑,看着他们怎么说话,办事,长见识,这些都懂了,才能正式上岗位。”

年广久也曾短期在饭馆、油行、布行等行业干过,对炒货行业的一招一式,他更是内行。他做生意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来处事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年当他听到大西北生产瓜子的地区遭灾的消息时,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四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久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

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久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久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久在公众面前的形像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久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久的后尘的,年广久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四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一百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五千六百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交国家税利达五百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一千人。

邓小平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久趟出来之后，给年广久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久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捣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久，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屈：“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久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久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十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崩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定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

施的年广久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久只想先应付定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久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久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久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久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胡耀邦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久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久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久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缺。再看一看吧！……”

年广久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

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然几经波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瓜子盈利的钱为芜湖捐款3万元,为安徽灾区捐款2万元,为敬老院捐款1万元,其余全部存入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一周后,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信中肯定了他近年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批评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做贡献。

转眼到了中秋,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久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久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三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傻子”年广久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久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广久“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年广久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为

的是要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久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三家开始挂牌联营。年广久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久出任总经理。

“傻子”东山再起

不论今天的年广久如何富有,他毕竟是一步步由穷困潦倒中走过来的,他深知穷人盼富的那种急切心情。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久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为数不少的百货公司和商店,抛出大把大把的彩票、奖券、奖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其名目繁多为建国以来所少见。年广久也赶着这股浪潮,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一名,奖小卧车一辆,二等奖二名,各得摩托车一辆……。

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久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这次的损失确实不能怪年广久经营无能,而是风雨无常。由于“傻子瓜子公司”元气大伤,也使芜湖瓜子行业出现了无可抗拒的整体滑坡。

破屋偏逢连阴雨,“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将他的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他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久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

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久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 he 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市检察院的正式起诉书，当法院开庭调查时，尽管“傻子”律师、辩护人条条按法，事事在理，为年广久辩护，他自己也激愤陈辞，竭力辩解，但仍然摆脱不了“有罪”判决。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何况并不完全是“傻子”的错，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更有人呼吁：“傻子是个体户的带头雁，是芜湖瓜子城的元勋，不应判他太重。”

年广久的两个儿子，都是炒瓜子的能手，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递到邓小平手里。1992年元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到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之道。无庸赘言，年广久很快就获得司法部门的无罪释放。



作者探访出狱后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

杜村 摄

“傻子”出狱后第一天头一桩事，就是给邓小平寄去一公斤“傻子瓜子”，请他品尝。一公斤瓜子的礼物太轻，但包含的年广久寸草报春的深情是极感人的。年广久是个大老粗，长期过着肩挑手提的小商贩生活，若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建设设计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傻子”是不会富起来，更不会辉煌起来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十多年间，解决了四百多人就业，为国家上缴税金一千多万元，为个体户争得了荣誉。这个功劳是不可没的。年广久出狱一个月，就给市领导写了封信，准备筹办瓜子股份有限公司，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更坚决地走下去。

小“傻”更比老“傻”强

年广久共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会做生意。大儿子年全宝，今年40岁，在中山路开了家全宝炒货店。二儿子年强当上了“傻子瓜子”公司总厂厂长，举着老“傻子”年广久的旗帜开拓前进。

年强今年36岁，个头不高，遮耳的长发下有一张青春饱满的脸膛，穿着做工讲究的西服，烟瘾很大，曾是一家无线电厂的采购员。后来才跟父亲学生意。21岁时远征新疆，搞起“阿凡提”瓜子，人们说他聪敏过人。一次我去芜湖采访他父亲，在铁山宾馆见到他一面，询问其父为什么自称“傻子”，他幽默地说：“在英语里，傻子这个词有另一重含义，即最傻的就是最聪明的。”

后来，我终于从芜湖新闻界的同行处获知，年强比起目不识丁的老“傻子”，运用他有文化的优势，在经营中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是他会运用知识产权为自己服务，目前“傻子瓜子”总厂在芜湖仅有三个分厂，主要靠商标和技术同外地加工厂搞联营，从收益中提取一定费用；二是在农村开辟了有一定规模的瓜子种植基地，保证原料充足，实行原料、加工、销售一条龙；三是针对现代人讲究营养保健的需求，从《本草纲

目》等大量典籍中检索瓜子的营养价值,提高产品质量的科学性。

笔者也问过老“傻子”年广久,两个儿子哪个会做生意?他说“老大全宝稳,像霍元甲,讲义气;老二比较滑,像龙海生,一肚子精点子,生意做得灵活,他的密探多,还收买我公司的人给他送情报呢。”

1984年全世界的广告费用达1500亿美元,这一年,芜湖各瓜子厂家的广告费也突破40万元,其中65%出自瓜子个体户。他们跳出小商贩的偏狭,聪明地学会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的传播媒介,树立自己的产品形象,给顾客提供消费指南。而年全宝、年强的广告,比他的瓜子前辈更气派、更富有社会新闻性。

1986年10月,小“傻子”年强在芜湖举办了“傻子杯”足球赛,人们问他举办足球赛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有三条:一,他本人喜爱足球,在学校时是个蛮不错的左边锋;二,芜湖人喜爱看足球,他要为家乡人做点好事;三,中国足球太落后,他想推动一下足球运动的发展。还有一点他没有说,但人们都心里明白:这是芜湖商业广告史上规模最大,别有意义的一次广告战,它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力量。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罕见的由一个个个体户发起的足球邀请赛主人,时年仅21岁,看上去还像一个孩子。年强在经营上比他父亲更精明,更富有冒险性。他重视知识与信息,这是比他父亲更高明之处。他还聘有一批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顾问,有一批比他父亲广泛得多的社交网。他生性敏捷,触觉锐利,双眼似乎总在不断捕捉战机。他走进芜湖群众艺术馆,一眼就从舞厅辉映的影灯和旋转的舞姿中,盯住了茶座的食物专柜。正巧,群众艺术馆舞厅要成立“月季花”乐队,缺少添置乐器的资金,找他给以赞助。他张口就给三千元。三千元在十几年前不算是个小数,但附带一个条件:舞厅茶座要为他代销瓜子。

1987年,一位年仅20岁的芜湖师范学院音乐系女生曹云敏,被推荐到年强家教他孩子钢琴。那时年强刚与前妻离婚,一个人既要经营瓜子,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难以兼顾。曹云敏的到来,不仅给年强这位个体户家中带来悠扬

的琴声,也给他带来慰藉和欢悦。1990年曹云敏大学毕业时,他俩已倾心相爱,当年12月份就举行了婚礼。

这位女大学生曹云敏,婚后对过着金丝鸟般的生活很不习惯,总想在经商上帮年强一些忙,可开始年强不愿意她出头露面。曹云敏经营“傻子瓜子”是在有意无意中开始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安徽有个傻子”,使在狱中被无辜关了三年的年广久得以获释,也使中国这个“第一商贩”名声大振,“傻子瓜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在这种情况下,曹云敏眼见自己丈夫又管生产销售,又要外出采购原料,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便主动帮他处理一些小业务。她很投入,也很细心,凡事经她手都井井有条。她待人诚恳热情,尤其是她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秀美的形象,赢得顾客的好评,许多商家都乐意和她谈生意,瓜子销量也因此而不断提高。年强对此颇为吃惊,未曾料到她的经商才能丝毫不逊于她的歌唱专业。

1996年,浙江电视台投巨资来芜湖拍摄电视连续片《傻子沉浮录》,刚刚接手业务的曹云敏敏锐地感到,这又是一个推动“傻子瓜子”发展的极好时机。她说服年强把门市部迁到繁华、租金昂贵的中山路1号,雄踞闹市中心广场,扼守商业街大门。凡来逛街的人都得首先经过她的店面。这一招确实很厉害,生意兴隆得可与公公年广久的店媲美。做了一辈子生意的年广久不得不佩服:“我家这个会唱歌的儿媳妇比二子还精啊!”

曹云敏的精明不仅仅在此,她的思想开放,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意识。她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文化艺术的优势,精心包装宣扬“傻子瓜子”,树立鲜明的企业形象。她从营业员服装到包装袋、宣传单都进行精心设计,还别出心裁地将“傻子”二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巧妙地组成一个“年”字,作为商品信誉和企业形象的标识,既醒目又美观,实在是独具匠心。她的设计水平,连一些专业人员也自叹弗如。她最满意的是拎包上的广告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责任编辑 方 徨)

「法国通」李风白



蒋国经

毛泽东的义务小报童

李风白（原名李泽鑫），1930年出生，湖南芷江人。他从小长得聪明伶俐，4岁时随父到了长沙，后师从于何叔衡先生，并经何叔衡指引，爱读《湘江评论》，他还带领伙伴们经常在长沙街头小巷叫卖《湘江评论》，成了毛泽东的一名义务小报童。

1920年9月，17岁的风白在何叔衡先生的鼓励下跟随徐特立、李维汉、肖三、蔡和森等进步人士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巴黎勤工俭学。

异域相识周恩来

1924年，李风白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并组织学习美术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学会。

一天，在他的授意下，该学会为了表现清高，发表了一篇“为艺术而艺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宣言。在巴黎的周恩来知道后，就找李风白、林风眠等同学谈话。周恩来耐心开导他们说，我们远离祖国来到这里，不是单纯为学习艺术、学习知识，真正目的是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李风白、林风眠等同学“离开政治搞文艺复兴只是空谈……”，再三鼓励李风白团结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周恩来的谈话给李风白等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有智慧、有远见，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敬佩的人。

1929年夏，杭州艺术学院（今浙江美术学院前身）给正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的李风白去了电报，聘请李风白为该院教授。李风白出于多种考虑还是接受了杭院的聘请，回国在美术学院任教授，并担任油画系主任。

李风白在杭州美院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夜以继日地教学、绘画，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培育艺术人才的事业中，希望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艺术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可是国家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人民痛苦不堪，文学复兴何从谈起，国家的前途何在？他矛盾、彷徨。又想起远在法国的未婚妻戴妮丝女士，重返法国的念头便时刻浮现在脑际。

1933年仲夏的一天，李风白怀着满腔悲愤，忍受着痛苦，含着泪水，再次登上远洋的客轮，依依不舍离开祖国来到巴黎。他一方面继续美术生涯，一方面组织巴黎华侨参加反蒋反独裁活动。

为人类和平而斗争

李风白第二次到巴黎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不仅对日寇恨之入骨，而且对那些不能制止日本入侵和使祖国沦亡的败类同样深恶痛绝。1935年，李风白在巴黎积极发起组织了一个以反蒋抗日、团结华侨为宗旨的华人组织“大道社”。这个组织还出版尖锐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杂志。后来他又

组织成立了巴黎“中国艺术研究协会”，经常冒着极大的风险发表文章，呼唤和平，反对战争。

1936年9月10日，李风白与法国姑娘戴妮丝结婚，举行了宗教仪式的婚礼。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并挑起全面内战。李风白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看到了希望。这时，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支持毛泽东在重庆提出的和平建国主张。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治理和复兴中国，他积极投身到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去。他的画、文章都以此为主题。

1945年9月，邓发代表解放区来到巴黎参加世界工人会议，并重新组织中共巴黎地下党组织。有一天，邓发与李风白等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邓发向李风白通报了有关延安的情况，风白也介绍了巴黎的有关情况。他怀着一颗灼热的心，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李风白工作积极肯干，随时随地能经受党组织的考验，1946年，他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风白信心十足，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之中，他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

1947年，李风白随中国工会的刘宁一访问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李风白的首要任务是做好翻译工作。这次出访，李风白见到了抗德斗争的英雄铁托。随后在保加利亚又见到了季米特洛夫这位在国际共运中久经考验的受人们尊敬的领袖。在交谈过程中季米特洛夫给李风白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风白深深钦佩他的智慧、谦虚和平易近人的品格。

李风白回到巴黎后，组织上又交给他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尽快翻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把这项任务完成后，党组织又调李风白去巴黎世界工联亚洲部工作。在此期间，李风白每天要查阅许多的资料方能写出有关的报告，他经常超负荷工作，每天晚上，妻子与他在灯光下并肩工作，偶一抬头，目光相遇，他俩总是心心相印，尽管工作多么辛苦劳累，但他俩总感觉到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风白最热切的期望实现了。他多么希望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祖国，看一看新中国的模样，可是党安排他留在法国，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他做。当时巴黎商界中有不少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追随者，这些人视蒋介石为民族领袖。李风白与同志们的任务是：做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还要尽可能团结使馆工作人员，尽力推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天深夜，有人朝李风白的百叶窗扔小石子。李风白小心谨慎地推开窗户一看，是一位使馆的参赞跳墙进院向李风白求援来了。事因是，使馆有7名外交人员起义支持新中国；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者聚集在使馆门前闹事，企图冲进使馆威胁起义者。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急需到

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呼吁支持起义者，但又不能引起法国警察对此事的干预。听了参赞的叙述后，李风白与妻子赶紧穿上衣服，乘上汽车去召集自己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李风白巧妙周旋，总算平息了



李风白在巴黎

事态,取得了胜利。

1951年,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具有权威性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进步人士称之为“人民联合国”。这一年,肖三受组织的委托,请李风白去布拉格参加由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和法共大力支持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理事会的中国秘书处需要一个熟悉法国又能为中国做联络工作的人,李风白是最佳人选,他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到了布拉格理事会后,李风白担任中国部秘书,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1952年12月,李风白与妻子戴妮丝又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这次大会比联合国大会还引人注目。大会期间,李风白整天忙着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人士;戴妮丝一天到晚忙着推敲大会发言的词句。李风白广泛地接触来自世界各地政界的、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物,并同郭沫若、梅兰芳等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祖国需要这位“法国通”

1953年秋,李风白接到李一氓的通知,经周总理批准同意李风白回国。李风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原计划9月初启程回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因当时到中国来的客人太多,飞机小而座位少,迫不得已又在伊尔库斯克多候了好几天。李风白携妻子及岳母回到北京已是10月3日了,但节日的气氛依然很浓。李风白亲眼看到亲爱的祖国解放了,人民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了,他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组织上原打算把李风白夫妇安排在外文图书出版社工作,妻子戴妮丝兼在北大教课,李风白还可搞老本行美术工作。当时因法文干部非常缺少,工作任务繁重,组织上决定李风白搞行政工作,李风白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李风白会见过不少过去美术界的老同事和老同学。当时正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这些同事、同学的事业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李风白感觉在美术方面人才济济,有他无他并不重要。因此,李风白决心在党需要的

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戴妮丝也是一样,她原来是搞教学工作的,在北大教书很适宜,但在当时,法国政府与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交,在中国的法国专家寥寥无几,想从法国聘请专家来华工作是不可能的,她深知此情,也就愉快地接受了外文图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的双重工作。当时北京的交通条件很差,北大校址又远,她只好早去晚归,不辞辛苦地奔波。

1954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一个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国前的一天,工作人员将出国随行人员的名单呈送周恩来总理审核,周总理见没有李风白的名字,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次出国不能没有李风白同志啊!风白同志的法文功底很深我是知道的。李风白一回国就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文翻译工作,他是一个法国通啊,我们非常需要这位法国通啊!”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要李风白随行出国。在随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段时间里,风白一直跟随在总理的身边。周总理对风白说:“你除了当好翻译外,还要负责接待好法国朋友。”按照总理的要求,风白广泛地接触法国各界人士,与许多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交上了朋友,使法国人和其他外国朋友进一步了解新中国,认识新中国,并对新中国产生了好感。尽管在会议期间,周总理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但他只要有空就与李风白谈论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并关心和询问李风白的家庭生活情况。周总理还谆谆教导李风白在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同时,千万不要放弃老本行,要大胆地追求艺术创新。李风白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诗人,这与周总理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960年春,李风白正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单位领导突然交给他一个紧急任务,陪同一批中国技术人员去法国购买电动机车。在这个出国团里李风白是唯一熟谙法国及当地居民特点的人,他既当翻译又负责联络工作。到了法国后,他们走了许多地方,他一天到晚总是为了促成买卖而忙碌。在谈及生意买卖的过程中,中方技术人员多疑、冷淡,法方人员则急迫、随便。只有风白真正理解双方心理,最后还是由李风白起调和作用,使双方在相互理解、信任的友好气

氛中达成交易。

周总理的特殊关怀

李风白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中，与妻子亲密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的翻译和定稿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总理多次在百忙中看望和接见李风白夫妇。

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特意来到外文出版社看望李风白夫妇及其他同志，在进餐时与李风白一起共同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景，并与风白夫妇等人合影留念。

1964年国庆前夕，李风白夫妇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周总理亲自指导编写、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总理执意将李风白夫妇拉到自己身旁就坐，并进行长时间的亲切友好交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李风白曾多次给彭真当过翻译；与彭真关系密切一些。个别用心不良的人对李风白也有怀疑，为难李风白的事时有发生，使李风白一度心情不愉快。周总理

知道这件事后，便安排李风白夫妇去陪同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学者参观游览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欣赏祖国的大自然风光；还特意安排李风白夫妇到香港小住一段时间。

1967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活动。席间，周总理特意将李风白夫妇介绍给毛泽东主席。当李风白夫妇走近毛泽东主席身边还来不及向他问好时，当时已七十四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就朝他

俩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李风白激动得热泪盈眶，要向毛主席介绍自己，毛主席风趣幽默地说：“不用介绍了，你曾经还是我的义务‘报童’呢。”此时此刻，李风白激动得泪流满面，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接见，使李风白一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并在他人生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尽管李风白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又是党的中层领导干部，但因他出生于旧时代的中层官吏家庭，又娶了一位洋太太，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不可避免地被批判过，还被撤掉了译文室主任等职务。仅在1967年间，他先后被调查过60多次。在李风白最烦恼的日子里，周总理多次打电话询问他的家庭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

当李风白被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周总理知道他身患糖尿病以及多种疾病时，特别指示学习班的领导对李风白的生活饮食给予特殊照顾，让他每周周末与家人团聚。周总理为了让李风白不背思想包袱，在1969年10月1日这天，又特意邀请李风白及夫人戴妮丝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

由于周总理的关心和爱护，李风白很快恢复了翻

译室主任等职。

1974年9月30日，李风白夫妇被邀请参加了周总理抱病亲自主持的国庆招待会。不曾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与周总理的永诀！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李风白夫妇老泪纵横，悲痛万分。清明节那天，李风白夫妇俩用松枝、白花亲手扎成花圈，晨曦未露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寄托对这位朋友、伟人的哀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李风白夫妇

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

□ 王景山

谈到五四新文化精神，我以为和爱国、民主、科学三者同时展现的，还应有改革、开放和批判精神。这在“五四”前后鲁迅身上也是非常明确而突出的。

鲁迅的改革思想，源于他早年坚信的进化论，源于他对外国的识见，特别是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和对现状的思考。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鲁迅坚信中国若求前进、发展，必须改革。在鲁迅看来，改革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前进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他留学日本时期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社会进化是希望所在，是从“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就开始了的。“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因为“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着物不止”。如果“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零落”，所谓“发展既央，隳败随起”。1927年他作《黄花节的杂感》一文，复指出“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因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即1935年，他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中仍然坚持他的“从古迄今，什么都在改革”的看法，认为“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

鲁迅一生身处的社会现实，更使他深感改革的极端迫切性。1925年他一再指出：读历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看现状，更感到“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同年他尖锐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1934年他又作重要补充：“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他从来认为：“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精华部分足以自豪，亦为世界各国所钦佩。但正因为它古老，留存的糟粕也不少，历史的积淀也厚，因袭的担子也重，

因此惰性也就较多，改革也就更困难一些。鲁迅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他在《两地书·四》中指出：“中国大概是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暗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他在《华盖集·补白》中进一步指出：“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他在1934年发表的《偶感》一文中再次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入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鲁迅说到“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是感慨系之的。

鲁迅深感改革之不易，他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五》、《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华盖集·北京通讯》、《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等文中深刻批判了阻挠改革的种种论调，但他认为最不易的则是“国民性的改革”。这是深层次的改革，较之表层的改革当然更重要，但也更困难。他在《两地书·八》中指出：“最初的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而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为进行改革，他在著作中大声呼唤“闯将”，主张革新者内心应有“理想的光”，提出“认真，热心”，“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等项要求，推崇“一往无前”而又“不耻最后”的“韧性”精神。于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改革者的形象。

纵观鲁迅一生，从学海军，学开矿，求兵强国富；到改治医学，寻求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到从事文学运动，以便改变人们的精神；再经过主张个性解放，进行思想革命，直到确认“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一不说明他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改革主张。

如果说“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两面大旗，那么“改革”和“开放”就不妨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求中国之现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一个闭关锁国的民族，一个闭目塞听的个人，是谈不到改革、进步的，因为他没有比较物、参照系。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正是为此，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一再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先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故曰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更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指出：如不睁了眼看世界，“这闭着的眼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在鲁迅看来，开放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度量，是一种魄力，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他在1925年写成的《坟·看镜有感》中，热情赞美了汉人的“闷放”，唐人“也还不算弱”。“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因此他们“取用外来实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有些朝代，“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能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的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乃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同文中又说：“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基于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广阔的开放胸怀，鲁迅一向强调向外国学习。他认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

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主义者。他主张追本求源，而不可舍本求末。鲁迅所重视的是“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因此鲁迅的“开放”和“全盘西化”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早在1907年所作《坟·文化偏至论》中，他就反对在向外国学习时的“偏至”，亦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绝对化。开放，向外国学习，自然首先是为了“洞达世界之大势”，但何取何舍，何去何从，却须经过仔细的“权衡较量”，要“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这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意”，我们的国家才能“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而在1934年所作《拿来主义》一文则可以说是集中而精确地表述了他对“开放”的看法。他强调：“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因此，首先是要“拿来”！但他同时强调的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之后，要“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鲁迅的这一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收。

批判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十足显示着的。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先驱没有学过辩证法，存在极端片面性，所谓“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不会区别对待。更有甚者认为十年“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性发展，再次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我以为，把假民主、毁科学、倡愚昧的“文革”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实在是最荒谬不过的了。单看鲁迅，就可发现他当时所进行的批判，决不是怀疑一切，更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不迷信偶像，不盲从权威，不唯上，不唯书，对在上者和世俗认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东西、不可改变的所谓传统，通通要问个“为什么”，予以重新审视，重新鉴别，重新论证。

勿庸讳言，鲁迅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及作为其代表的所谓“孔孟之道”，是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批判态度的。但也不是“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即使对我们山东同乡孔二先生，他还是把真正的孔夫子和被当做“敲门砖”的孔夫子区别开来，同时肯定了孔子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孔子对鬼神看法、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干精神等等。又如对于所谓“孝道”，我以为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他认为“二十四孝”的孝子事迹中，有的“可疑”，有的“甚至于发生反感”，因而予以嘲笑和谴责，但有的却是可以“勉力仿效”的。而鲁迅自己对待母亲，实在堪称一大孝子。至于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他整理、编辑的《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肯定都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和他因反对将青年脱离现实的道路而批判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鲁迅一生大力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糟粕部分，而对其中的积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鲁迅不但不予以否定，甚至是身体力行的。五四新文化和鲁迅共同具有的这种批判精神，和“文革”奉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信条，毫无共同之处。说五四先驱们没有学过辩证法，必然存在片面性，这样的逻辑我看不一定符合事实。没有正式从书本上学过辩证法的，未必不能从实践中学会并掌握和运用辩证法；而自以为娴熟辩证法理论的，办起事来有时竟难免也会陷入片面性的泥坑。这样的例子，有目应可共睹。

五四运动距今80年了。在对五四新文化精神和鲁迅精神，毫不例外地同样予以重新审视，重新鉴别，重新论证之后，我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留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批判这三个方面的精神，也都未过时，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洛松）

傅斯年 1949 年 1 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 年 12 月去世, 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二年的时间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这个时期的所做所为, 过去大陆了解甚少, 记载颇多讹误, 近几年随着资料的面世, 对傅斯年这一段生活有了较多了解, 这里叙述几个片段。

临去徘徊

1948 年冬,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 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 一来感到台湾大学人事政务难以处理, 二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台湾, 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 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 权衡再三, 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 1948 年 8 月从美国治病回国, 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其回国不要担任繁巨行政职务, 如果操劳过度, 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 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斯年回国不久, 就开始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 身体已感不堪承受。当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 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 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 亲自找傅斯年晤谈, 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 1948 年 11 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 但并没有前去上任, 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 年元旦之夜, 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 呈现出凄惶不安的景象, 此时胡适正从北平回到南京, 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 两人置酒对饮, 相视凄然。一面饮酒, 一面谈论时局, 尽管两人都是民主人士, 但与国民党政权关系较为密切。他们目睹国民党政权军事惨败, 政治孤立, 既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又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二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 马亮宽

人同时低吟起陶渊明的《种桑长江边》。回首数十年之往事, 奔走操劳, 殚精竭虑, 取得了抗战胜利, 可是国共内战又起, 他们虽然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 但最终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在国共之间, 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 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 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 自己何去何从, 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 留恋乡土之情顿生, 思前想后, 两人都十分伤感, 不禁潜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 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 12 月 15 日致函傅斯年, 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 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 12 月 18 日、20 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 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 莅校主持。陈诚于 1 月 5 日就任台湾省主席, 同日致电傅斯年, 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 电报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 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 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 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 希先生速驾来台, 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 他的催促, 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傅斯年平时办事以干脆, 有决断著称, 这次因关系他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 所以格外慎重。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 三日三夜未出房门, 绕室踱步, 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 考虑去留问题, 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 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 并且已买好了机票, 临时决定, 把部分亲属留下, 退掉了机票, 对他们说: 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 我可能很快就回来, 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 月 19 日, 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 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整顿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于1928年建立的,原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日本建立此学校的目的是对台湾人进行奴化教育,所聘用的教职人员多是日本人,其管理和教育都是采用日本模式。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1月由中国接收,改名国立台湾大学,由罗宗洛出任校长。由于日籍教师大部分撤走,师资缺乏,再加经费困难,罗宗洛任职不久辞职,其后陆志鸿、庄长恭继任,三人任职长的不到二年,短者仅数月。台湾大学在日本人撤退时,就是一个烂摊子,接收重建以来,校长频繁更换,没有得到很好治理,傅斯年就任时,学校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外部台湾政局动荡,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量撤往台湾,其中许多大、中学学生被裹挟去台,要求入学就读的学生骤然增加,学校难以容纳。傅斯年就任后决心全面整顿,其整顿和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积极罗致人才,整顿教师队伍。傅斯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对高校中师资的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强调:“大学以教授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他对此阐述说:“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上,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坏,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日籍教师撤离后,台大教师很少,又因台湾穷僻之地,与大陆有海面相隔,局势又不稳定,大陆学者教授一般不愿赴台任教,故高层人才奇缺。而同时,大批军政人员撤至台湾,许多人官场失意,欲进入台大任教,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想

到台湾大学兼职,而这些人多是学无专长,仅依仗权势或辗转请托谋求教职。傅斯年针对这种情况,排除种种干扰,坚持以才学取人,对各种请托严加拒绝。他曾对各界公开声明,聘任教师只注重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坚决不接受因所谓积极反共或官场失意的贤士到台大任职,他说:“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而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他到任不久,便在主持的第一届校务会议上制定了《“国立”台湾大学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标准共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教员新任及升级根据学术成就、贡献(见于著作或发明者)及年资、教学成绩为准。”又专门建立了“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使教师聘任规范化、制度化。按规定,要聘任一位教师,先由院长与系主任商议,向校长提出;或由校长委托院长考虑,经院长同意,然后提交学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后送“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样自下而上反复审查,才能决定聘任一位教师。

由于傅斯年到任时台湾大学师资十分缺乏,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校名望,傅斯年利用仍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特殊条件,聘用了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台湾大学教课。如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高去寻、石璋如、王叔民等都曾受聘到台大任教。傅

又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从大陆各地罗致和吸收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历史系的刘崇宏、方豪、陶希圣,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方东美,外文系英千里、赵丽莲,化学系钱思亮、张仪等,这些人皆学有专长,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再加上原有教授,台湾大学在不长的时



傅斯年(左)与胡适合影

间内成为师资队伍阵容整齐的综合性大学。

其二,严格实行考试制度,杜绝人情,择优录取学生。在台湾光复之初的几年里,台湾大学由于日本人撤退以后许多管理制度、章程都废除了,新的规章制度没有建立,所以教学管理十分混乱,招生考试马马虎虎,请托作弊现象严重,学生良莠不齐,许多学生只要考得入学资格便万事大吉,吃喝玩乐,不认真学习,学校也不管不问。傅斯年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一定要把好学生吸收到学校,再经过严格教育,使学生德才兼备,学校的责任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因此,他到任后,首先从严格招生考试入手,把好录取学生的关口。而做到这一点,有相当大的困难。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再是由于战乱,流亡台湾学生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台湾惟一的“国立”大学,自然是青年追逐的首要目标,故台大招生的压力很大,许多权要试图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子女送到台大,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混乱。

1949年夏季是傅斯年到任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生,为保证学生质量,傅斯年在校刊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招生办法,他说:“这次办理考试,在关防上必须严之又严,在标准上必须绝对依据原则,毫无例外。由前一说,出题者虽有多人,但最后决定用何一题,只有校长、教务长知道,这是任何人事前无法揣到的。印题时,当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一楼上,断绝交通,四周以台北市警察看守,仅有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故无人能知任何一个人之分数及其录取与否。”他着重声明,自己一定秉公办事,决不会循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即是我对于一切经考试不及格而进不来者或不考试而进不来者加以极不公道之待遇,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的看,照样的办,一切全凭本领了。我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

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在录取学生阶段,又在校长办公室门旁用毛笔赫然写一个条幅:“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由于傅斯年制定了一系列招生制度,又带头严格执行,使1949年招生顺利进行,基本上刹住了请托、说情、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为避免考试题泄露,傅斯年严格实行“入闱”制度,即在台湾大学图书馆选一间房子,命题人不准携带其他不相关的物品进去,出完题就呆在里面,等到考试结束才能放出。傅斯年的老友屈万里曾回忆当时情况说:“出题时之审慎,印题时关防之严密,迥非外人所能想象。印题的场所门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岗警,有人用‘如临大敌’四字来形容,确恰到好处。”

傅斯年也承认用这种方法招生有不妥之处,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种招生办法,充满着防贼的心理,申韩的‘治术’是与教育原则不合的。”但他又认为:“在目前不能无考试,既有考试,即不能不如此。”也确实如此,这种严格的招生制度,杜绝了许多弊端,对于扭转台湾大学校风和学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对学生严格管理。傅斯年采取种种措施严格考试录取制度,只是保证优秀学生能够被录取,有求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为学生学习创造优良的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傅斯年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修定台湾大学“学则”,改变学生不努力学习,随意旷课,混资格、混文凭的现象。其主要措施是实行学分制,严格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杜绝各种形式的作弊行为。如规定“学生学期成绩不及格科目之学分数,达该学期修习学分总数三分之一,不得补考,即令退学”。“凡旷考者以零分计,全部旷考者,自然退学”等。傅斯年说到做到,1949年第二学期结束,因成绩不合格退学者多达31人。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权势者,子女被勒令退学,他们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向学校发难,有人在省参议会上对傅斯年提出咨询,给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傅斯年坚决不肯让步,他在回答咨询时强调说:“台大光复以来,实不能尽人满意,本人到校之

初,所见情形,不特不能达到教育之理想,而且将为社会之累赘,故尽量改革,求其实事求是,求其进步。在校学生必须养成向学之习惯,然后学校风气方面可良好。养成良好习惯之办法不一,而加严课业,实为必要。向任何学生不论在校成绩如何,皆能随时毕业,则学校万无进步之理。”

二是设置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为贫困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傅斯年在教育上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教育机会均等,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应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更是努力实现这一理想,在台湾大学设立几种奖学金、助学金,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傅斯年在致学生的公开信中曾特别强调:“诸位中要想鬼混的,休想政府的帮助,其用功而有优良成绩的我决不使他因为无钱而辍学。”傅斯年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临死前几分钟,在省参议院回答参议员是否废止助学金问题时再次强调:“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的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摒弃于校门之外。”据统计,仅1949年就有1600人享受了各种类型的助学金。

三是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在傅斯年任校长以前,台湾大学内没有学生宿舍,个别需要住宿的同学在校外租房居住。傅斯年出任校长时,因各种情况流亡到台湾的穷学生相当多,他们住不起校外的公寓,只好在学校内寻找栖身之处。研究室、教室乃至洗澡间,到处都住有学生,甚至台大医院传染病房,也成为学生宿舍。傅斯年面对这种情况,实在是既心疼又头痛,不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学校简直无法再办下去,要解决又谈何容易。傅斯年曾经声称:“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其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即是不近人情

的。”他奔走呼吁,四处求告,终于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加紧建造了一批学生宿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1800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占全校人数的60%,整个学校学生住宿问题大为缓解。

傅斯年曾在台湾大学校刊第56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其中第一个理想是崇尚“平淡无奇的教育”,在其中强调了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第二,加强课业。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的运动。他概括说:“以上的话,总括起来,可以说一句笑话:‘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玩。’”

争取教育的相对独立

傅斯年早年就主张教育独立,强调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他一再强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北大学生傅斯年当时为学生总指挥

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更是积极争取和努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府对教育过多地干预。

他任职期间，整个台湾相当混乱，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稍有嫌疑，就有被逮捕屠杀的危险。对台湾大学也是如此。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系考。”当时人的一些书信和回忆文章都说明，军警宪特到台大不能肆无忌惮。傅斯年力争此项权力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傅斯年这些行为都是他教育独立思想的外在表现。正如他去世后台湾的一

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困难的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斯年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其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这种评论反映了傅斯年在教育方面的立场和行为，坚持教育的相对独立，与干涉破坏教育的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

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具有严重依附和等级思想。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立场和意识。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有人曾引《后汉书》范滂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称赞傅斯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傅斯年一生不从政，从事教育和学术，努力保持个性独立，在某种程度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统”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要求教育独立，并为之努力奋斗，在当时是可贵的。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锐意改革，统筹大政，同时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

坐卧不安。”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说得更明白，他说：“我可以说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本来不堪过分劳累，因此，身体不久便垮了下来。他也知道校长事务繁多，自己的身体难以胜任，曾向朱家骅诉苦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多，我吃不消，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但是说是说，做是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皆劝其静养，他置若罔闻。夏天，又患了胆结石，动手术休息几天，尚未痊愈又开始了工作。11月，教务长钱思亮赴法，傅斯年的工作更加繁忙。

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

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被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被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原来台湾大学保存一批由大陆运出的器材，结果被台湾大学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后来被侦破，当时在社会引起一定反响。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终于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傅斯年猝然去世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给予这位大气磅礴的学人以高度评价，台湾大学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傅斯年，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从此，傅斯年安葬地称为“傅园”，每年都有许多人前往祭奠凭吊。

(责任编辑 吴 思)

邮购合订本及《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本刊1999年合订本(总82-93期)已经装订完毕。另1996年至1998年合订本尚有少量库存。

价格如下：

1996年	精装52元/套	简装49元/套
1997年	精装54元/套	简装49元/套
1998年	精装56元/套	简装51元/套
1999年	精装56元/套	简装51元/套

以上均免费挂号邮寄。

1995年以前的合订本已无存货，仅有期号不全的部分单刊可供补刊。为满足读者要求，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迷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社地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65072452

联系人：谷世章

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

□ 宋金寿

我与温济泽同志相识是1980年的事。那时,我正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为协助李老弄清楚王实味问题,我们先后访问过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温济泽同志也是王实味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原为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兼学术秘书。整风运动开始后,临时调院党委搞宣教工作,直接参与处理过王实味问题,并在当年就写过反映王实味问题的《斗争日记》一文,是我们必须访问的对象。1980年5月10日,我们访问了他。

由于温老温文尔雅的风度,执着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近20年里,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志。

“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

温老对我说过:“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谦虚和自责。要是在延安整风中,按温老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也许就不会有王实味冤案了。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他时,温老就明确地说:

1. 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当时丁玲写《三八节有感》,也没有人说她“反党”。
2. 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
3. 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

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温老在延安整风中对于王实味的基
本看法。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温老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因工作关系,参加批判王实



温济泽在家中

味的一些情况。他说,开始他不认为王是“敌人”,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他相信了康生的话(见本刊1992年1月号)。

由此,温老被误认为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此事,至少在中央研究院是尽人皆知的。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又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那篇文章实际上变成了“违心”之作,故尔,温老没有把它收入到自选的《征鸿片羽集》中去。

现在看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王实味冤案是由李维汉引发,康生插手,毛泽东参与并最后认定的。其他人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铭记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

李维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为党为国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但到晚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曾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撤职、挨斗，甚至坐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能获得解放。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1980年春起，李老倾注极大的精力，撰写回忆录。王实味问题是他直接参与处理的，因此，他对我们说：

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兰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

经过我们的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的资料，搞清王实味问题已经有了基础。但是，李老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认为王实味问题，原先是由组织作出决定的，重新审查的结论也应由有关组织作出。因此，在他的回忆录的征求稿中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李老非常慎重，因此把它称为“悬案”。他是这样写的：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后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向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

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总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所表现的观点与温老同我们所谈的看法，两者完全一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反党集团”等的所谓“铁案”。1982年2月，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个人的平反遇到了麻烦。因为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自动”前去“中共统治区”的“托派”。故此，中组部的同志表示，对王实味的平反无能为力了。

但是，李老并没有最后放弃。在临终前，嘱托给了温老。温老是这样记述此事的：

1984年7月、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在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温老不仅铭记李老临终前的“嘱托”，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王实味平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李老逝世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使王实味的平反出现了转机。

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文章在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王实味，以及陈其昌与王实味的关系以后，着重指出：

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

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着重号是原有的)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 1929 年至 1934 年这个时期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

王凡西的这个“证词”，无疑为王实味的平反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1986 年 6 月《瞭望》杂志第 22 期发表了《创造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一文，传达了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信息。文章转达了胡启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所说的三个案子，其中“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0 年得以平反。因此，胡耀邦说“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案，含有应给以平反的意思。

正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作有关王实味问题注释，首先找到了温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如何为王实味作注伤透了脑筋：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能不能成立？王实味的真实身份又该怎样确定。对此，温

老向他们介绍了王实味在延安被批斗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否定了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指控。同时温老介绍他们向我了解有关王实味的情况和资料。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为王实味作了这样的注释：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可以说是给王实味作了一个初步的平反。

《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出版以后，温老告诉我：注释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龚育之、逢先知主持作出的，经胡乔木审阅、并同意的。应该说具有权威性。

但是，加给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应该说是毛泽东记忆中的差错。在延安批斗中加给王实味的是“托派”、“五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头衔，所以，为王实味平反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为此，温老曾多次写报告向有关部门为王实味提出申诉。1986 年 11 月，温老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1. 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 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 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温老表示：可以由他组织)，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有关渠道送出去，始终未能到达对王实味案能作出决策的人手里。1988 年 3 月，温老又写报告。这个报告，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离休老同志之手，直接送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桌上。宋平在审阅以后，批转公安部办理。

公安部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6 月 30 日即派人与温老取得了联系，温老同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又建议向我作了解，我也向他们作了介绍，并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后来，温老告诉我，公安部的同志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底，就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批阅，以便正

式宣布。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事情被搁置,1991年初,有关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温老对我说,据透露:在王实味平反问题上,参与划圈的14位领导人,都划了“○”,表示同意;在恢复王实味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位领导人划了“○”,是绝对少数。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



王实味夫人刘莹仅存的一张王实味照片

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并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沉冤50年,经过12年的周折,王实味冤案得以平反,与温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温老为王实味的平反 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温老对我说过:他最恨“左”啦!“左”把党和国家害苦了,把许多人害苦了。但温老没有说,也把他害苦了。其实他自己也受过“左”的苦,长达20年。

温老十分赞赏胡耀邦的这样一个思想:“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的恶劣作法不能再搞了。他认为,从批判王实味到批胡风,直到批“三家村”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的总结。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由于温老的就王实味平反召开一次座谈会的建议未能付之于实施,温老只好自己动手写出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发表在1992年1月的《炎黄春秋》

杂志上,稍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温老在文章中说:“我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此后,温老不辞辛苦,搜集历史资料,组织有关同志撰文,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1993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温老为该书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为什么这样‘左’?”的问题。

温老认为:发生王实味冤案,“左”的原因主要是:1. 对托派的错误看法。2. 对敌情的过火估计。3. 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判断的恶劣作风。4. 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5. 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6. 不愿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同时提出了应该吸取的教训:1. 一定要实事求是。2. 要注意防止“左”。3. 要发扬民主,倾听不同意见。4. 要建立和健全法制。5. 要允许当事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对于这些观点,温老结合延安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的实际作了详尽的剖析。其中,温老特别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并强调:“对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切实注意。”

但是,温老认为这样的总结远远不够,应把从王实味到批判“三家村”写出一本书来,总结“搞运动、打棍子”这种“恶劣作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当代人,启迪后来人,终止这种做法,创造国家和民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温老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大概在1993年的一次交谈中,对我说了这个心愿,希望由我为主来写作这本书,他作顾问。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意见,写好了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但我认为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有限,信心不足,表示“打退堂鼓”。此后,我不知道温老是否另有什么考虑和安排。

温老的遗愿未能实现,自然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责任编辑:文贤)

蒋经国出掌 台湾谍报系统

□ 木 木

“内控”蒋经国

蒋经国曾经是台湾谍报巨擘。

但说来好笑的是，这位台湾谍报巨擘抵台之初，却非但无权过问台湾谍报系统，反而是台湾谍报系统的内控对象。

蒋经国最初抵台，大概是1949年6月间的事。这时的国民党成了落汤鸡，蒋经国在国民权力体系中也差不多成了落汤鸡——上海打虎极大地触怒了孔宋家族，蒋经国遭受强力反击，功败垂成不算，自己也被视为“问题人物”。在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的半年多时间里，蒋经国没有任何职务，蒋介石长子是他唯一的名分。无权可用，无公可办，每日黎明即起，从四条通寓所赶到“总裁办公处”，聆听“严父”教导或开卷苦读。就这样别人对他仍放心不下，制定了严密的“保护监测计划”。他走到哪里都有“地下跟班”，名义上保护蒋经国的安全，实则是盯梢。每天有哪些人到四条通寓所和蒋经国见面，他有没有带人、带哪些人到蒋介石官邸谒见蒋介石，这些人是什么背景，什么意图，等等，“地下跟班”都必须详细记录，以“最机密”、“最速件”——上报。“地下跟班”的官方名称叫做“特别防卫专案组”，简称“保防组”，一共两组，每组组员若干，大多化装为“三轮车车夫”，布置在四条通寓所和蒋介石官邸四周，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视蒋经国。

一位亲历其境的台湾谍报人员，晚年有过如下回忆：“我曾因‘中间’的职务关系，看到其中一个‘个案’的案例：先是在四条通跟从的人

员发现石凤翔（蒋纬国元配夫人石静宜的父亲）经常往四条通蒋公馆跑，于是即在石凤翔私用电话秘密接线监听，进而知道‘二二八’首要分子蒋渭川”“透过住在香港的‘党国元老，曾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关系，欲向先总统亲自表示悔罪自新之意”“许崇智乃要石凤翔居中奔走，通过蒋经国的管道，带蒋渭川谒见先总统。”于是经由对石凤翔电话的监听，连蒋渭川在谒见蒋介石时曾痛哭流涕表示悔罪，蒋介石对他的失足走错了路，表示不追究等等讯息，都在监听电话获得资料之中。

这个案例，算是“监测”蒋经国的许许多多案例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抽样。

“监测”蒋经国的外勤谍报员和内勤主办参谋之间的通讯，均使用化名，而且化名时时更换，所以绝对无法从档案中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换句话说，他们看得见蒋经国，蒋经国则不仅在当时看不见他们，事后也没办法查找他们。

负责“监测”蒋经国的“保防组”，隶属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该处现在的职责很单纯——主要对付“匪谍”和“叛乱组织”。但在1949年以后的几个年头中，保安处的职责却要宽泛得多，可说到了无所不至地步。权力之大，堪与戴笠时代的“军统”相比。而当时保安处最感兴趣的，则是走私、套汇、地下钱庄等经济类案件，办这些案，有私货、外钞、不动产供他们查封、没收和拍卖，所得钱财依“法”可提出三成作为破案奖金，成为合“法”外快。这些合“法”外快往往高出本饷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重赏

之下的勇夫，自然是趋之若鹜了。因此，他们对“监测”蒋经国这样的大人物的“专案”，莫不视为“苦差”——这种事既偷不得懒，又没什么合“法”外快，典型的吃力不讨好。但上峰有令，岂容违抗，保安处不得不侦骑四出。

九个月的严密“监测”，没有发现蒋经国有丝毫异常，其政治忠诚度确实无可质疑。于是，决策层恢复了对蒋经国的信任，开始授以重权。

其中一项重权，便是接管台湾谍报系统。

蒋经国出山

国民党谍报系统表面上共戴一尊，实际上门派庞杂。主干有两个，一个是“军统”，一个是“中统”。同样性质的机构，为什么要如此叠床架屋？这就是蒋介石统治术的特点——谍报机构单一化，就容易坐大，把他这个后台大老板架空。机构有两个以上，使之互相牵制、互相竞争，操纵者自身的安全度才有保障。但这也有弊端——各谍报机构之间争风吃醋，彼此挖墙角，免不了坏事：甲单位发现一个“匪谍”嫌疑，剥茧抽丝，费尽心机，即将收网的时候，那个“匪谍”嫌疑却突然被乙单位秘密诱捕。甲单位不但前功尽弃，甚至连所花费的经费都无法报销；掠人之美的乙单位则借此邀功，提职加薪。蒋介石为此深感头痛，便在抗战初期亲自主持会议，召集戴笠、陈立夫、朱家骅、王凡生、杨宣诚等谍报机关首长，商讨如何“统一情报工作”。蒋决定设立“中央情报委员会”，当场指定王凡生为中央情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宣诚为副主任委员。对蒋的这个决策，谁都不敢公开反对，但实际上谁都不肯买账。各谍报机构依旧各行其是，彼此勾心斗角，直至败退台湾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步调。1949年—1950年，台湾谍报机构至少有如下几个山头：

1. 最大的谍报机构——保安处，其前身是台湾光复之初，陈仪接收日据“台湾军司令部”而组建的“台湾保安司令部”第二处。该处不仅是侦查机关，并可直接捕人、直接审讯乃至判刑。

2. 中统和军统。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前，中统和军统各自在台湾设有“情报站”。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不仅总局搬了过来，甚至各省、市情报站的“高级人员”，也辗转来台到总局报到。台湾这块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一下子成了世界上谍报人员密度最高的地方。

3. 各军种司令部，以至军、师单位，也都有第二处的建制。

军队的“第二处”，原本只负责军队内部的保卫工作。1949年阎锡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时，下令要求第二处的情报人员“并需兼顾共匪扰乱地方秩序及阴谋破坏社会治安等足以危害戡乱阵营安全之活动”，从此军队谍报机关也在社会上伸展腿脚了。

此外，国民党宪兵、“国防部技术总队”等也有抓人办案的权力。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国民党谍报机构还要照搬大陆模式，多头发展，彼此竞争，在如此狭小的政治空间里拳来脚去，恐怕伤的都是自己人，把剩下的一点本钱折腾个净光。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决定整顿台湾谍报机关，把林林总总的各派各系统统归属到一个人的麾下，实现统一调度。

这个人便是“太子”蒋经国。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蒋经国？原因之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谍报机关实现整合之后，尾大不掉便成了主要危险；谍报大权因此更是生死攸关。再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即：蒋经国确实能够膺此重任。国民党谍报系统上上下下无不是山精水怪，没有真本事而想在这些人跟前强出头，必定自取其辱。

蒋经国则确实才智过人。兹举其大端：

1. 记忆力惊人：凡是和蒋经国打过照面的人，多年之后重逢，他略一思索大都能够复述出当年见面的情景。这种本事是很有魅力的——对方会觉得自己在“小先生”心目中有地位，觉得“小先生”真是看得起自己，而兴“士为知己者死”之慨。

2. 煽动力强：蒋经国擅长演讲，雄辩滔滔，声情并茂。这对塑造其政治明星形象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3. 特殊的亲和力：蒋经国看起来没什么架子，对高级官员严厉而对部属则宽松，能做到“犯而不校”。有一个考入训练班的华侨青年，晚上起来在宿舍门口就地小便，碰到夜巡的蒋经国。那青年不认识蒋，根本不在意。蒋经国问他怎么可以在这里小便？他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蒋经国说：“不好看嘛！”那侨生毫不客气地顶他：“你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有什么不好看！”蒋经国笑笑就走开了。第二天蒋经国训话，把这当故事讲出来，但并未点那侨生的名，大家听了个前仰后合。那侨生才知道头天晚上碰到的是何方神圣，感动得不得了，竟至向朋友表示：这种老板，我为他死三次都愿意。

4. 富有冒险精神：据说蒋经国不怕死，虽未曾上刀山下火海，但真的遭遇险境，还能从容应对。他曾到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游击区”视察，跟普通士兵一样，腰上挂两个手榴弹，腰间别一支手枪，在杀机四伏的战地来来往往，神态自若。

5. 求知欲旺盛：接管谍报系统之初，蒋经国对谍报业务所知甚少。上台后勤于钻研，不耻下问，很快就进入了状态，通晓了谍报业务。台湾一些资深特工甚至断言，蒋经国是真正洞悉两“统”精微之处的仅有的一人。

6. 有用人唯才的雅量：和所有政客一样，蒋经国不可能不搞自己的圈圈，以致曾被讥为“非‘干’不可”——不是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在他跟前就甭想做大官、掌实权。但蒋经国主管谍报系统期间，几个要害部门的历任首长，如安全局的郑介民、陈大庆、夏季屏、周中峰、王永澍；情报局的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调查局的张庆恩、沈之岳、阮成章，乃至中央党部二组、六组的主任，都没有一个是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的。相反，他的两个私交极好的留俄同学王新衡、严灵峰，虽然是谍报界的老资格。蒋经国也未安排他们做单位首长，而是做顾问使用。

7. 不偏听偏信：谍报人员出于职业特性，养成某些古怪习惯，其中之一是谍报机关内部小报告成风。如果偏听偏信各种密告，一定纠纷不断，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蒋经国对关键的人和

事，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绝不小报告所动。有人“举报”来台后升任某机关首长的资深特工，曾接受中共地下组织定期津贴。眼看此人在劫难逃，蒋经国认为“不至于此”，一句话宣布结案，未加追究。

这些政治性格，注定了蒋经国不会是等闲之辈，善于收揽人心，驾驭大局。在蒋氏“太子党”中，确实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要他当“特务头子”，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经国本人对此又持什么态度呢？言人人殊，但有个事例可供参考：1961年夏，台湾当局举办“阳明山会谈”，正式会议结束次日，蒋经国组织与会者游览他主持修筑、刚刚竣工的公路。在车上介绍民工如何克服重重艰险，开拓这一贯通台湾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听众感慨不已。岂料正在兴头上，笔名“马五先生”的香港时报总主笔雷啸岑却突然没遮没拦地大声喊起来：“经国兄，你修这条横贯公路，有大功于台湾，将来会以此而在史册上流芳的；但是你不该去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只会在史册上留骂名！”此话一出，全车顿时鸦雀无声，场面极为尴尬，素以大度著称的蒋经国脸上也变了颜色。冷场十几秒钟，蒋经国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种事！”突如其来的口舌之争，使得气氛大变，后半段行程大家全无兴致，蒋经国也板着脸不再解说了。

毛人凤当道

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碰了很多的大钉子。

在外界看来，两“统”都是蒋介石对付政敌的利器，手掌、手背都是肉。实则并非如此。蒋介石对“军统”极为偏爱，每每提及坐飞机摔死的“军统”头目戴笠，总是充满了怀念之情。对“中统”蒋介石则往往冷淡，竟至在很正式的场合说过中统“拿假的情报来骗我”之类的重话。在这种情况下，他要蒋经国接管谍报系统，自然是选择当时已更名为“保密局”的“军统”为突破点。

但蒋介石过于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想到，

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毛人凤，现在对他并不是那么顺从。按蒋介石的计划，让蒋经国接任保密局局长，原任局长毛人凤退为副局长。毛人凤却竟然抗命不受。其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自不量力，有的说是自恃功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毛人凤自信有比蒋介石更大的靠山，有恃无恐。关于这一点，毛人凤在台湾谍报系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郑介民有过婉转的解说。毛人凤死后，郑谆谆告诫他有意扶植为接班人的叶翔之：“不要跟（蒋）夫人太接近，总统是很忌讳这一点的，毛人凤就死在这上面。”郑介民一生大智若愚，不轻易用这样庄重的口吻对部属讲话。他那段话讲的应该是实情。“韩战”爆发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海，既公开为台湾当局充当保护伞，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沟通的主要中介，则是宋美龄。当时曾有人借用医学名词为台湾官场的政治分野下定义，蒋介石一系称作“内科”，蒋经国一系称作“小儿科”，宋美龄一系称作“妇科”。“妇科”因有美国背景，权倾一时。毛人凤在当时走的就是“妇科”路线。有宋美龄为他撑腰，他当然可以谁的账也不买。

强龙不压地头蛇

蒋介石当然不是省油的灯。毛人凤拒不移交，他岂会就此罢手，拐个弯儿，还是让蒋经国把谍报系统全盘抓了过来。

1950年2月28日，蒋介石连下三个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三是派“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第三个手令——你毛人凤不是不服蒋经国吗？得，我就派个层级比蒋经国更低的彭孟緝来领导你。

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时，任高雄要塞少将司令，曾率部开进市区杀人。因其“处置果断”，而为赴台“宣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所赏识，台湾改建“行省”后被白氏保举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彭虽官运亨通，但在国民

党退台之后，将星云集，他这个区区中将，就显不出什么了。即使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毛人凤、郑介民、叶翔之、叶秀峰，哪一个都比他的资历高出一大截。在等级制度严格的谍报系统中，彭孟緝要“协调指挥中央各情报单位”谈何容易！蒋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选择彭孟緝，估计出于两种用心，一是针对毛人凤的自负，故意派个层级较低的人去领导他，以打击其气焰；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让地头蛇彭孟緝上阵，先作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

由于毛人凤等的抵制彭孟緝开始也是一筹莫展。蒋介石几次召见彭孟緝垂询“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进展情况，彭孟緝只能以“正在协调之中”为对。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彭孟緝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在保安司令部发现了戴笠的学生郑绍远，如获至宝，马上任命郑氏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郑氏知恩图报，便向彭孟緝献了一计。彭孟緝依计以“司令”名义，设宴款待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酒过三巡后，彭亮出蒋介石授命他“统一”谍报系统的手令，向副主管们“请教”统一办法。副主管们挨个看了手令，一时谁都不肯贡献“高见”。彭孟緝就势提出了早已拟好的腹案：

1. 各机关谍报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发给的工作证，才能在办案时要求户政机关、军、宪、警机关，邮电检查机关配合。

2. 为了避免各单位在工作时发生重叠冲突，请在座各位参加“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互相协调之责。

3. 凡从事谍报工作之各单位人员，如无工作证证明其身份，而为治安机关察觉，均以“冒充谍报人员”论处。

与会者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赴宴的，对彭孟緝的三条不可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且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也实在不便贸然反对——彭持有蒋介石手令，公开反对无异与蒋介石唱对台戏；何况彭氏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并未将他们排除在外，他们的个人地位已经有了保障。于是一个个在酒酣耳热之际，欣然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彭孟緝随即将各单位副手

签字的会议记录呈报蒋介石。蒋介石读了好高兴，立即批示：签字的各单位副手即为“台湾情报委员会”委员，直属彭孟緝领导；以正式公文通令各单位知照。毛人凤等各单位主管发现上当，但木已成舟，再反对已来不及了。为了不丧失从事谍报活动的“合法权利”，纷纷把各自在台的谍报人员名册、照片、级职等等资料悉数送到“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领取工作证。

就这样，彭孟緝略施小计，便把台湾所有谍报机构的内情全部掌握，而后实现统一调度，自非难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因此膨胀到惊人的地步，以致于当时堂堂“行政院长”陈诚，有事下条子交办，条子也写着“彭主任明照兄”的字样。

彭孟緝初步整合了台湾谍报系统，但他并不是十分清醒，没有意识到他不过充当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因而稳坐在“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椅子上，毫无“功成身退”之意。好在由他久经宦海的老子支招儿，说彭孟緝“威势震主”，应知居高思危之道，把谍报大权推给蒋经国。彭孟緝这才慢慢开了窍，在一次谒见蒋介石时，谦称自己德薄才浅，不堪膺此重任，恳请另荐贤能如经国先生，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就此，蒋经国正式接管谍报机构。蒋氏父子当然视彭孟緝为功臣，待他甚厚。

在利用彭孟緝“清道”的同时，蒋介石父子对付毛人凤的另一招，是设立“总统府机要室资

料组”，“资料组”主任自然是蒋经国。这样，借助“资料组”，蒋经国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合法性有了保障；借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蒋经国又有了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实权，蒋经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务头子”。

蒋经国的“资料组”，后来发展为“国家安全局”。这里又有一段故事。

1954年7月，蒋介石下令组建“国防会议”，其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按照老蒋的意图，仍由蒋经国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恰巧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没办法，老蒋只好让步。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士林官邸。走进客厅，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舌战。郑提心吊胆地坐下来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这不好，因为美国人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认为，还是介民当局长的好。”郑介民赶紧起身推辞：“我不行，我身体不好。还是经国兄当局长吧。”这时蒋介石慢腾腾地发话了：“介民，你就不要客气了嘛。经国我会安排的，局长你就先当着吧。”蒋经国则毫无表情，一言不发。郑介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告辞后，宋美龄把他送到门口，小声嘱咐：“你作局长辛苦，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助手，他就是军统局的老同志阮清源。”郑介民哪敢回绝？也一口应承下来。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却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派亲信陈大庆当“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宋美龄推荐的阮清源只能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个班主任，差点没把宋美龄气死。其实岂止是副局长由蒋经国指派，就连局长郑介民，后来也不过是蒋经国的傀儡。国安局真正的老板是“小先生”即蒋经国，这在台湾谍报系统是一个无人不知的秘密。一直到蒋经国去世，台湾谍报系统都在他的直接掌控之下。只是在他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再不能事必躬亲，这才委由“国防部长”代管某些部分。

（责任编辑 吴 思）



摄于50年代初期的蒋经国的全家福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中国社会正萌发着一个大的变动。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由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早已说过:“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的,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后来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

中央其他同志也有这种想法,并且议论开了,陆定一也参与了这种议论。

那是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写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写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

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1958: 关于共产主义 公社的 一次畅想

□ 陈清泉

5月间,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19日陆定一作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谈了一些理论问题,认为革命的理论,是革命经验的总结。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检验理论的正确程度,并发展理论。他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理论是发展的,对新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因而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来抓住和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在这个发言的最后,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

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18日晚,他(陆定一)在推敲经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时,在结尾的部分,新加了(上面)这样一段话。虽然陆定一同志这段话包括着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编书的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全力突击,6月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城市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本文选自《陆定一传》,已由党史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吴思)

在英国感受的人际默契

□ 李 岚

在英国,公共场所及公寓住宅,门都是自动弹回的。开始我不知道,推门便“义无反顾”地走进去。后来发现,英国人的习惯是,推开门后,一定要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在几步距离之内有人走来,就要用手扶住门,等他(她)进门。这样做,避免了门反弹时碰到后面的人,也显示了一种尊重和礼让。这样的细节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果你步行在一条有很多岔路的街上,无论是拐进还是驶出岔路口的车,都会主动给你让路。你若为它“留步”,驾车的人就会给你一个友好的手势:请先走。在地铁站乘传送式电梯,不管是上下班高峰,还是平常时间,人们都会自动站在电梯右侧,把左侧让给着急赶路的人……

在英国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既是这样行为的施与者,也是被施与者。今天你驾车,你给步行的人让路;明天你步行,驾车的人为你让路。这次你走在前面,为后面的人扶着门;下次你在后面,前面的人为你扶着门。我为他人、他人为我相统一,社会便出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默契。我初次来英国在伦敦转机时,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帮我推着行李,跑了大半个机场,找到登机口,验了票。又把我送进候机室,嘱咐我见大家都起身时便准备登机。我心里感动得不行,可在英国人看来,这很平常。记得那天从伦敦飞到B城天色已晚。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东跑西跑

找学生宿舍的钥匙,又把我的行李全部扛上三楼,却不肯多加租车费。他逻辑很简单:如果顾客愿意给小费,他就收着;不给,他也理所应当这样服务。安顿下来第二天,上街采购油盐酱醋。瓶瓶罐罐拎着太重,半路停下来歇息。为抓紧时间学两个英文单词,我蹲在购物袋旁,看商品介绍、使用说明之类,不觉有人在身后:“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原来是一对英国老夫妇,住在这条街上,见此状,以为我的购物袋破了,从家里为我取了几只塑料袋来。在英国,我从来没见报纸电台号召过助人为乐之类,也知道英国不是全民信教的国家。可每每遇到难处,总有素不相识的人援之以手。有一回我买蔬菜水果,不小心真把购物袋搞破了,滴溜溜的西红柿、苹果顺着破口往外滚,我捡了这个,丢了那个。正狼狈不堪时,一位中年妇女路过。她把自己买的东西都掏出来抱在怀里,递给我一只购物袋。我不好意思要,她乐呵呵地说:“我的东西不那么圆,比你的好拿。”还有一次,我在伦敦错过了公共汽车,迷了路。当时正值上班高峰,一位赶着上班的乘客竟主动下车,陪我找路。他带我换了两部公共汽车,又走街转巷四处打听,一直把我送到目的地。那天伦敦降温,他见我穿得单薄,半路上,还特地请我到咖啡店喝了杯热咖啡……

这些经历让我不知不觉走进那美好的默

契,轮到别人需要我时,我也特愿意卖力气。扪心自问,别人善待你,你有没有亏待了别人?这不是雷锋境界,也不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恰恰相反,正是从自己的“我”,推己及人,走进别人的“我”。平平常常,给与也被给与。正如一首歌所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所谓“真”,就是不否认“私”的合理存在。从自我获得充分尊重,学会尊重他人。在英国,“private”(私有的、个人的)是个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词。一提到这个词,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受到保护。举个例子:BBC有两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是没有广告的,为此政府征收电视税,每年100多英镑。如果你没交,会有人登门造访,但没有你的允许,他绝对不能进门。哪怕你的电视正开着,他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也是白搭。他不能以此给你开张罚款单,也不能把你告到哪儿去。在英国,一个人的住宅是私人重地,如果不是警察拿着逮捕证来,你可以把任何人拒之门外。再譬如停车。你有再急的事,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也不能把车停到人家私人住宅的院落里,哪怕那里面大得可以停上三、五辆车。如果你不知道,误把私人住宅当成公共场所,宅主会塞上一张条子在你的车里,下次就不能明知故犯了。

英语里有一句常说的话,直译成中文是“管好你自己的事”,言外之意就是少管人家的闲事,尊重别人的个人生活和隐私。在工作单位,与上司、同事们相处得再熟,下了班最好不要因为一点事给他们打电话,以免打扰人家的个人或家庭生活。和朋友聊天,不管俩人如何肝胆相照,也不能“无话不谈”。即使是夫妻,相互之间也留有“私”的余地。记得有一次和先生去银行,因为我站在他旁边,营业员便把他的帐户平衡表扣着递出来,为的是不让我看见。

在英国中小学,也没有人教育孩子们压缩自我的存在空间。学习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为找份好工作。中学读到初二,老师便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谈未来职业选择。如果一个学生谈理想:将来我要多挣钱、买好车、住好房子、玩遍世界名胜、吃法国蜗牛、日本生鱼、中国烧鸭……只要他准备遵纪守法,靠自己努力获得这一切,没人觉得

这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抽去每个个体的“私”,人和人的价值就变成空洞的概念。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消灭了私欲,这个社会就会自行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并不是什么坏东西。每个人都有天赋人权去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

但是,“有私”并不等于“自私”。英语的“private”(私有的、个人的),和“selfish”(自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自私”是无视他人的存在。从自私出发,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的默契就没有了。因此,英国父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制止他们的自私行为。记得楼上的邻居露依思,一次闲聊时很认真地对我说,她两岁半的儿子开始自私起来。什么时候都是“我的”、“我要”、“给我”,不知道还有别人。我没想到在一个如此强调自我的社会,母亲对一个尚未完全懂事的孩子就有了“自私”的担心。

如果既承认“私”的合理存在,又反对“自私”,不需要强迫性的克己、律己;不需要外在的号召、提倡,凭着默契,给与的行为就像下里巴人,一人唱,万人和。每个人都有自我,如果你觉得你的自我应该获得肯定和张扬,就不应该认为他人的自我是可有可无的。这便构成了人与人之间默契的基础。

一位国内的朋友曾经问我:“这种默契在英国是怎样形成的?”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本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使人性、人的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全球高科技革命,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为西方社会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社会环境的有序性和精神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督教的传播对西方人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使在传统受到巨大挑战的今天,它的劝善扬善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默契形成的原因也许是多元的,三、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没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没有“八亿人不斗行吗”的领袖教导;没有“地大物不博”、人口膨胀的生存竞争;也没有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的背离。扯远了,就此打住。

(责任编辑 吴 思)

麋鹿的发现 与失而复得始末

□ 郭 耕

1900年是麋鹿在中国灭绝的年头。一百年来，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麋鹿的失而复得与国运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

麋鹿，俗称“四不象”，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鹿科动物。从春秋时期至元明清，古人对麋鹿的记述不绝于书，屈原、班固、许慎、杜甫、沈括、苏轼、陆游、李时珍、乾隆……曾提及麋鹿的古代名人不胜枚举，甚至传说姜子牙的坐骑、指鹿为马、逐鹿中原的典故皆与麋鹿有关。鹿这种动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的祭物，还作为生命力旺盛（鹿角年年落而复生）的标志和升官发财的象征（福“禄”喜寿）。

全世界约有40多种鹿，惟麋鹿是一种集自然演化（与人类同步）、地理分布（中国湿地）、人文记载和曲折身世诸多离奇于一身的动物。麋鹿之奇尤其表现于它身世的非凡，而这传奇般的身世竟与一位法国传教士有着不解之缘，要不是当年阿芒·大卫隔墙一瞥，恐怕麋鹿的故事就不会如此曲折跌宕、悲欢离合地充满戏剧性了。

那是1865年（清同治四年）秋季的一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植物考察，经过南苑皇家猎苑，大卫从苑外土岗上向内窥视，他双眼一亮，那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博物学家当然以发现新种为荣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使他盘桓数月，不肯离去。他的惊骇是有道理

的，因为这是全世界惟一幸存的一群麋鹿。无奈皇家禁地不允许外人进入，大卫更弄不到一只活的麋鹿。直到次年初，大卫才设法买通了守苑的军士，在一个“月黑风高夜”，猎苑的守卒秘密地以20两纹银为代价将一对鹿骨鹿皮换给了大卫。不久，法国驻大清代办亨利·狄白龙又设法弄到了一对，其中雄性死掉后也送给了大卫，大卫神甫便于1866年4月将这3只麋鹿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米勒·艾德华馆长的鉴定，这不仅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的独立的一个属。当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中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便被称为大卫神甫鹿，至今其英文还是Pere David's Deer。大卫对物种科学的贡献可谓劳苦功高，大熊猫、黄山猴、绿尾虹雉、娃娃鱼……有上百种动植物都与大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娃娃鱼的学名A davidianus），蜚声海外。大卫对于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从1866年至1876年的十年间，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去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动物园中。后来，日本国大臣对清朝出使的官员还提出：“南苑有四不象，日本向无此兽，本国君主极为倾慕，欲得之以扩眼界，恳请见赐一对”，清廷便通知内务府奉宸苑办理赠鹿事宜。

可见清朝末年，麋鹿因大卫的缘故红极一时，从“养在深苑人未识”忽然“一举成名天下知”了。

1894年，京南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围墙，方圆210平方公里的皇家猎苑一片泽国，许多麋鹿逃散出去并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秋，八国联军趁清朝政府腐败、防务空虚一举攻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苑，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使中国特有的这种珍奇之物从此绝迹。据说，在某王府尚存一对，后转至“万牲园”，不久便死掉。举世公认，1900年，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无巧不成书的是，麋鹿的发现者阿芒·大卫也于1900年11月10日在巴黎溘然而逝。

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被欧洲一些动物园圈养的麋鹿，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圈舍取代了湿地），种群规模逐渐缩小而纷纷死去，越养越少。这时出现了一位使麋鹿绝处逢生的人：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一位酷爱动物，特别喜爱鹿科动物的人士。1898年起，他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麋鹿，共计18头悉数买下，这成为地球上奄奄一息、香火仅存的惟一群。从各处收集来的18头麋鹿都被放养在英国伦敦以北四十五英里，占地三千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这座庄园水草丰美，林木葱郁，芳野幽旷，曲径绕湖，是英王爱德华六世于1547年封给大臣约翰·罗素即后来的

贝福特公爵的采邑，为英格兰地区七座对外开放的著名古典园林之一。除了麋鹿之外，还有中国河鹿、黄鹿、印度花鹿、欧洲黇鹿等，所有动物均自由散放。据说那些寄人篱下的麋鹿整日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呆立水畔，拉着长脸，表情呆板地顾影自怜，像害了思乡病一样，但毕竟能正常繁衍了。191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8

头，二战时已达255头。二战以前，乌邦寺的主人始终以“保有世界惟一麋鹿群”为荣，一头也不肯出让，但二战中德军的战火染指英伦，当时子承父业的小贝福特终于改变了主意，提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他担心这惟一的一群麋鹿再次毁于战火而遭后人的唾骂，便将乌邦寺内的麋鹿向国内外各大动物园转让了许多。到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均为当初的18头麋鹿的后代，遍及亚、欧、非、美、澳各洲，但惟独没有回到它们世代生息的故里：中国。虽然在1956年和1973年各有一对和两对麋鹿运至北京动物园，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与从前许多欧洲动物园一样，一直未能复壮种群。

中国是麋鹿的老家，随着祖国的强大、稳定，许多中国动物学家呼吁：让海外游子麋鹿还家。其实，这也是乌邦寺主人的心愿，1984年3月，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委托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玛娅·博依德女士来华调查情况，选择回放地点。麋鹿曾在中国东部广泛分布，到底应放回到那里呢？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谭邦杰、黎先耀、郑作新、周明镇、汪松、王宗祯等参加了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对北至辽河，南至苏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广泛的调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北京南海子作为皇家猎苑旧址，作



皇家猎苑故地南海子中的麋鹿

为麋鹿模式标本的产地，作为麋鹿一度在华灭绝之地和南海子依稀如旧的湖泊荒原，基本还保留有原来的自然地理风貌，无论从文化历史意义还是从自然生态角度考虑都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

贝福特公爵的曾孙塔维斯托克侯爵听了玛娅带回的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当即决定赠送20头麋鹿给中国，重新放回南海子。在给环保局金鉴明同志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麋鹿还乡一事，对我和我的家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您一定知道，是我曾祖父挽救了麋鹿的灭亡命运……120年前，大卫神甫因为科学界发现麋鹿而载入史册，同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经历过120年漫长岁月后，又致力于把这种著名动物送还南海子老家的人……”

1985年2月17日，由北京市政府、城乡建设环保部、中国动物学会等组成的麋鹿引进小组与乌邦寺的代表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定了麋鹿引返中国的协议。同时在伦敦，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与中国驻英使馆代表也在协议书上签字。北京南郊农场为此慷慨提供土地900余亩。1985年5月，北京麋鹿苑开始兴建。

1985年8月24日，一架满载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飞机，将22头麋鹿（其中两头给了上海）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望。后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举行的一个欢迎中国领导人访英的宴会上致辞，曾把麋鹿的重返家园与香港问题的解决同列为中英外交史上的大事。可见，麋鹿还家是中英外交关系的一段佳话，是国际自然保护人士合作拯救濒危物种的创举，是中国政府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成功实施重引入项目的范例。“历尽劫波麋鹿在”，麋鹿既是一个活生生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物种，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如今，麋鹿保护事业已走过15个春秋，在新老保护人士的努力下，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北京麋鹿苑、湖北石首、江苏大丰三大种群及全国十几处动物园小种群已繁殖成活麋鹿800余头，种群扩散工作仍在进行中。1999年国家环保局与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启动了一个旨在吸引公众参与、以麋鹿保护及其曲折的身世为主题进行环境教育和爱国主义宣传的“麋鹿之友”项目，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科普大楼主会场颇为风趣地用中文讲了这样一席话：“麋鹿曾因迷路到了欧洲，现在终于顺利还家了，祝愿它永远不会再迷路。”事实上，地球上真正应该防止迷路的，甚至说多少已经有些迷路的物种不是别的动物，而是人类自己。麋鹿正以其沧桑多舛的命运和不幸中万幸的结局告诫我们：迷途知返吧！路就在脚下！

（责任编辑 吴 思）

尊老敬老 弘扬围棋国宝

第七届“炎黄杯”敬老围棋邀请赛在京举行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棋会友、增进友谊为主旨的第七届“炎黄杯”敬老围棋邀请赛，于2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文津俱乐部举行。

一年一度的邀请赛由文津俱乐部、北京老同志围棋会、炎黄春秋杂志社等单位承办，参赛者主要是在京的离退休革命老前辈和知名的专家学者。

本期邀请赛经过三天的角逐，沈勃、李克光（四川）分别获得一、二大组冠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本届比赛组委会主任唐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组委会副主任冯征等为获奖者颁奖并先后在会上讲话。

复熊向晖质疑

□ 王 瑁

拙作《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发表后,看到熊向晖对此文的“质疑”,答复如下:

一、如此“无所作为”

拙文列举了在王石坚案发生后,李克农陆续采取了如下善后措施:1、要有关同志查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2、寻找脱险同志的下落;3、安排返回解放区的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4、对该案中回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组织学习和进行审查;5、对遇难的烈士进行追悼;6、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这些虽然还不是他所采取措施的全部,但也是很重要的。熊向晖对此段内容竟视而不见,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无所作为”,“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不顾事实,妄加指责,令人难解。

正当解放战争高潮急需情报的时候,重要情报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李克农的焦虑和痛苦确是笔者亲眼所见,是情之必至,理所当然。他关怀、爱护干部也是有口皆碑的。熊向晖斥为“牵强附会”,竟滥予嘲笑,蓄意丑化。李克农精明强干、坚决果断,在业务上会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拙文这段标题写的明明白白,中心是要表现李克农在本案人员的审查和处理上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和高度的原则性。不能在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李克农高风亮节、功勋卓著,在国家安全战线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纪念他百年诞辰是很庄重的事情,而熊向晖竟以轻薄之词给予冷嘲热讽,是不严肃的,是对

先贤的失敬,对读者的轻慢。

至于“质疑”中提到我的这段文字与开诚所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有关的内容与措辞完全相同一节,在此简单说明一下。我于1989年3月写过一篇关于李克农的回忆录《最可宝贵的因素》,载入《纪念李克农文集》,其中163页谈及此事,拙作再次引用了自己这段叙述。此书于1989年8月出版,早于开诚之书八年零两个月。至于文字相同,是偶合还是开诚参考了本人原作,不得而知,即使有所参考也是正常的,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无批件论”可以休矣

为王石坚翻案的一些理由中,“无批件论”是熊向晖在“质疑”中的新发明,目的无非是以怀疑李克农对此事的传达来否定王石坚是叛徒的定论,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请看一系列的事实。

1. 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严刑拷打,被判徒刑。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纯惨遭杀害。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

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认为是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大事犒赏有功人员。王石坚也因有功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后随国民党撤到台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和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

由此可见，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他长期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

2. 康生 1967 年 4 月 28 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的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共产党。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共产党，胡宗南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 1956 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3. 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此事的内在联系、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李克农的传达和中央对王的定性都是势所必行、行所必至，是此事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根据大量事实，中央确认王石坚彻底叛变，忠心事敌不过是一言可定、顺理成章之事，铁案如山。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顾顺章、叶青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叛徒，都是他们背叛革命的丑恶实践所决定的，

而不是靠什么人的“书面报告”和中央“批件”所决定的。李克农当时常传达中央领导的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事项，如果都要求必须有“批件”才相信和服从，有些工作将陷于瘫痪和寸步难行。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所谓“无批件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熊向晖讲，中央对王石坚的认定竟与自己《地下》一文中对王的注释有所不同。这又何必惊讶，把注释改过来就是了。

三、口吐不实之辞

1. 熊在“质疑”中说：1998 年 11 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王瑀发言中并未谈及李克农传达王石坚叛变投敌、中央认定他是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的事。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在 11 月 23 日下午发言，专门谈了这两个问题，与会的十五、六位同志都听到了。录音带保存完好。

2. 质疑中引用熊《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说，“1949 年 5 月笔者回京，先见罗青长，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大批敌伪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1949 年本人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据我确知，该年 5 月我部并未查获与王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与此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是 1950 年下半年之后才从南京查到的（这些档案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因工作关系，几百份案卷我全部查阅过，其中根本没有敌人对王石坚的全部审讯记录。所以 1949 年 5 月罗青长接见熊向晖时绝对不可能讲上述的话。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十七处提到陈忠经，详述了与他们的来往及掩护关系的情况。虽还未提及情报关系，但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 页、《我的特务生涯》（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李海生、完颜绍元著《军统巨枭毛人凤》(上海人民出版社),四书有关章节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都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因篇幅关系不能详引,但几本书所述相同,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3. 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会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鹤寿还说:“不要一风吹。”我认为这些话是对王石坚翻案的意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明确王石坚的叛徒问题不能翻案,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央对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已经定了案的,否则“王石坚不能翻案”又从何谈起呢?与会的王鹤寿、陈野苹现已辞世,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做证。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讲话中说:“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王1940年6月到西安负责领导情报工作……,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伯克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上见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

以上两项极重要档案材料白纸黑字,赫然

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清清楚楚证明了确实有个别领导一再要为王石坚翻案,而且受到了批评。显而易见熊向晖断定“无人为王石坚翻案”之说竟然全是不实之辞。

熊向晖既然要对王石坚问题发表议论,档案馆近在咫尺,普通知情者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只热衷于请教职务高的老上级而不肯眼睛向下,迈开两脚,做些老老实实的调查了解呢?

四、“辩诬”和“诬辩”

“质疑”认为拙文所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看罢毛骨悚然。在肃杀的寒气中,忽然记起熊向晖的一段发言。也是在1998年11月23日上午的座谈会上,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譬如王石坚的问题,1993年开国家安全会议时,住在京西宾馆,找我和陈忠经谈要为王石坚平反的意思。他有功,1947年,他在西安有三栋房子,我住在他院子里,王被捕后敌人搜查,把我存在他哪里的惟一的皮大衣、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纸和桌上我的许多照片都搜去了。他供不供是明摆着的事……,总理的判断是对的,他供出来胡宗南也要压下的。他到台湾后的情况你并不了解呀。”(以上见熊向晖的发言录音带,现存国家安全部情史研究处)这里熊本人也批评了某领导不该为王石坚翻案,而且他的发言在我发言之前。

熊还声称要为领导“辩诬”,精神可嘉,一片对领导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但请不要忘记了中国一条古训,“君子爱人以德”,这个“德”一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不然有变成无原则奉承的危险,爱之反足以害之,有失共产党员的清誉。正直的领导也是不会接受的。这样去“辩诬”,难免画虎不成,反成“诬辩”,结果越帮越忙、越辩越污。岂不可悲。

五、仅此而已

坚持气节教育是我党的一贯传统。江泽民

主席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浩然正气，保持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高尚革命气节对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尤其重要。许多情工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敌人心脏，李克农等龙潭三杰深入虎穴，保卫党中央；李白上海滩英勇赴死；谢士炎等五烈士血洒雨花台；都是安全战线的千古楷模。那些无耻叛徒是反面教员。要世世代代教育安全情报干部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这才是安全战线在政治上的钢铁长城。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对一切有功的同志要十

分尊重爱戴；对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尽管过去有的有功，也绝不能情丝缠绵、眷恋不舍，甚至去为他们翻案。否则弄得是非混淆、好坏不分，只能起到瓦解斗志、自毁长城的作用。因此在拙文中除怀念李克农的丰功伟绩外，特别强调了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崇尚革命气节的精神。同时也希望偏离党的原则的同志有所改正。“质疑”中追查拙文“是何居心”，谨答曰：有帮助同志之忱，无阿谀讨好之用意；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扶正祛邪，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1999年12月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美林、李锐、韦君宜的著作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忆	季美林	19.50	3.00
思痛录	韦君宜	13.00	3.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红色家族档案			
——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罗点点	22.00	3.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8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温济泽的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思忆文丛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原上草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六月情	牛 汉 邓九平	25.00	4.00
荆棘路	牛 汉 邓九平	23.00	4.00

(购买全套《思忆文丛》邮费 7.00)

《温济泽的自述》，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本书记录的有他亲见的许多中共党史重大事件，有他对友谊往来的政治风云人物。他对瞿秋白、李维汉、博古、周扬、胡乔木等人的追忆、评价，尤其引人注目。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 290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思忆文丛》收集了 1957 年的文章 200 余篇。以此献给曾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以往鉴来”，以期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资料中育出更多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 1 号，邮编：100007，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炎 黄 春 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革命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您 若错过了邮局 2000 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 4 日出版，16 开本，内文 80 页，60 克双胶纸；彩封，157 克铜版纸。每期售价 4.80 元人民币。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电话：(010) 64072452

邮编：100007

欢迎订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为 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因存书不多，恕不拆套分卷出售)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
麋鹿的发现与失而复得
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一次畅想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581/K 邮发代号: 80-507 定价: 4.80元